

“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工作领域分析报告”研究团队

专家顾问组成员 杨东平 梁晓燕 贾西津

陶传进 邓国胜 段德峰

课题组负责人 梁晓燕 杨东平

课题执行负责人 刘 叶

课题组核心成员 刘 叶 刘胡权 战 洋 郭 君

案例调研组成员 刘 叶 刘胡权 战 洋 郭 君 王 辉 黄胜利

杨 旻 张仲华 徐冬梅 韩嘉玲 王 璇

本报告由徐氏家族慈善基金会资助，内容并不代表徐氏家族慈善基金会立场



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年会
China Biennial Conference for Educational NGOs

联系方式

电话 010-62236842

传真 010-62234332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8号金丰和商务苑C座409室

邮编 100088

网站 <http://www.21cedu.org/>

邮箱 editor@21cedu.cn

引言

一、助学

- (一) 教育公益组织助学项目的社会背景和政策环境 3
- (二) 典型助学案例 4
 - 1. 免费午餐 4
 - 2. 春苗营养厨房 5
 - 3. 爱心包裹 6
 - 4. 阳光书屋 6
 - 5. 麦田计划 7
- (三) 教育公益组织助学项目的发展趋势及挑战 8
 - 1. 发展趋势 8
 - 2. 难点与挑战 9

二、支教

- (一) 教育公益组织支教项目的社会背景及发展现状 12
- (二) 典型支教案例 14
 - 1. 短期支教 14
 - 2. 假期支教 15
 - 3. 长期支教 17
- (三) 教育公益组织支教项目的发展趋势及问题 20
 - 1. 发展趋势 21
 - 2. 问题及争议 21

三、教师专业发展

- (一) 社会背景及政策环境 24
- (二) 典型案例 25
 - 1. 包含教育制度创新的教师培训项目 25
 - 2. 创新教学模式的教师培训项目 26
 - 3. 短期学习、目标定向的教师培训项目 27
- (三) 挑战与建议 28
 - 1. 问题及挑战 28
 - 2. 对策及建议 29

四、留守儿童情感关爱

（一）教育公益组织参与留守儿童问题的背景及现状	31
1.留守儿童的核心问题	31
2.社会各界关爱与服务留守儿童的整体情况	31
（二）留守儿童关爱公益项目典型案例	33
1.成长陪伴	33
2.心理指导	34
3.书信交流	35
（三）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的发展趋势及建议	36
1.公益组织能有效弥补政府失效	36
2.公益组织可为的空间	37
3.公益组织需加强自身建设	38

五、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社会融入与发展

（一）社会力量参与流动儿童教育的背景与历史	40
（二）公益组织参与流动儿童教育的典型案例	40
1.资源链接类项目	41
2.课程支持以及课外活动类项目	41
3.教师能力建设类项目	43
4.社区公益项目	44
（三）公益组织参与流动儿童教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46
1.取得的成就	46
2.存在的问题	46

六、儿童早期教育与成长

（一）公益参与儿童早期教育活动的背景	49
（二）典型儿童早期教育案例	49
1.办学模式	49
2.课程建设	51
3.教师队伍建设	52
4.社区教育	53
5.互联网幼儿教育	54
（三）教育公益组织早期教育项目的发展趋势及方向	54

七、阅读推广

（一）社会背景及发展现状	59
1.民间公益阅读机构数量迅速增加。	59

2.儿童阅读成为近年民间公益阅读的主要阵地。	59
3.从捐赠图书到促进阅读、教育革新和社会重建。	60
(二)典型案例	60
1.心平公益基金会	60
2.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61
3.陈一心家族基金会	62
4.担当者行动	62
5.新教育基金会	63
6.立人乡村图书馆	64
(三)问题及发展趋势	65
1.阅读公益生态圈需要不断完善和形成良好的循环	65
2.加强分工和协作,不断提高公益阅读组织的专业化程度	65
3.准确定位,坚持个性,不断提高公益项目和产品的策划和执行能力	66
4.健全公益机构管理机制,吸收优秀公益运营人才,不断提高公益管理团队素质和运营水平	66
八、多元教育资源提供	
(一)教育公益组织多元教育资源提供的社会背景	68
(二)典型多元教育资源提供的案例	69
1.根与芽绿色阳光行动(环境教育)	69
2.梦想课程(生命教育)	69
3.天下溪乡土教育(乡土教育)	70
4.甘肃伏羲班(全面素质教育)	71
5.桂馨科学课(科学教育)	72
6.歌路营青少年参与式艺术教育(艺术教育)	73
7.“阿福童”儿童社会和理财教育课程(理财教育)	73
(三)教育公益组织多元教育资源提供项目的发展趋势及问题	74
九、职业教育	
(一)教育公益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背景	76
(二)典型公益职业教育案例	77
1.百年职校	77
2.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	81
3.休宁鲁班木工学校	81
(三)教育公益组织职业教育项目的发展趋势及问题	82
1、发展趋势	82
2.问题与挑战	83

十、研究与倡导

（一）教育公益组织从事研究倡导的概况	85
（二）研究倡导公益项目的典型案例	85
1.专业化的政策研究倡导	85
2.兼具研究倡导职能	88
3.以行动研究服务教育创新	89
（三）研究倡导公益项目的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	90
1.基本特征	90
2.未来的发展趋势	90

引言

近年来，教育公益组织蓬勃发展，教育公益组织数量明显增加，工作领域也更加细化。在本次报告中项目组对目前教育公益领域比较活跃的十类案例进行了归类和分析，以期帮助教育公益组织的从业者清晰行业现状、了解自身所处的位置并发现未来发展方向。

一、助学

助学是指那些在学校教学活动之外，以捐钱捐物的方式，帮助学生改善就学条件的行为或活动。因此，在概念上，它区别于那类着眼于改善教学过程的支教活动。在实际操作中，根据工作的侧重点不同，教育公益组织的助学项目主要提供四类支持：求学费用支持、就学生生活条件的改善、就学学习条件的改善和校舍支持。助学项目是教育公益组织开展比较早的项目，因此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从事助学活动的组织也比较多。根据收集到的数据，从事助学活动的教育类公益组织占全部被调研组织的54%，超过半数。

（一）教育公益组织助学项目的社会背景和政策环境

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的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的加速流动又在城市内部生产出巨大的差异，使得上述空间上的资源分配不平衡进一步复杂化。教育类公益组织所开展的助学类项目，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之中应运而生的。它们的出现，就是看到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看到教育公平远未实现，希望在政府之外，从公民社会的层面推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合理整合。因此，从教育公益组织开始行动的第一天起，它们就和政府之间有着微妙的互动。要动态的理解助学项目的变迁，就要把教育公益组织助学和国家的相关政策结合起来看。

2005年之前，国家还没有实施税费改革。农村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乡统筹的资金，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是农村居民自己花钱办基础教育。在这种情形下，很多困难家庭交不起学费，儿童辍学；很多校舍年久失修，成为了危房。因此，对求学费用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校舍的修建也显得比较紧迫。自1988年开始，“希望工程”把农村教育的困境展现在了公众面前，激发了社会各界的助学热情。当时，助学项目的种类还相对单一，基础教育阶段的助学金、奖学金和生活经费的发放也成为助学领域的常规项目。由于这类项目的门槛较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到2005年左右，求学费用支持项目得到了最多关注，参与人数也最多。同时，校舍维修和校舍建设项目是当地的常见需求。

2003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研讨会，会上确定了“两免一补”的政策。所谓“两免一补”，指的是国家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政策。按照时间表，2005年，在中国256个贫困县实现了“两免一补”，2006年，在中国中西部农村实现了“两免一补”，到了2007年，在全国的农村中小学实现了“两免一补”。这样一来，大部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就不用为支付学杂费而担忧了，助学项目中对小学、初中阶段求学费用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必要性。此外，由于中国近年来的城乡流动加速，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谋生，造就了农村的“留守儿童”群体。由于父母在城市打工，能够带回现金，“留守儿童”们并不缺少入学的学费。他们面对的是金钱不能够直接解决的问题。直接支持求学费用，并不能解决这部分孩子面临的实际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教育公益组织开始将高中生作为求学费用支持的受益群体。总体上看，求学费用支持的助学项目有所萎缩，受益群体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同样重要的政策变化是2001年开始推行的“撤点并校”政策。这个针对全国农村中小学开展的教育布局调整，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近年来教育公益组织的助学工作。大量农村小学被取消后，各地兴建了大量寄宿制学校。然而，很多新建的寄宿制学校并没有配备食堂等学生生活设施。寄宿制学校的住宿生活也给学生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新的挑战。教育公益组织要应对这样的新情况，很多组织开始针对学生

就学条件、学生生活条件设计项目。近几年，这类旨在提高学生就学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助学项目，往往得到了更多的响应和关注。此外，虽然“两免一补”政策解决了学生的学杂费问题，然而，“撤点并校”政策又带来了路费、食宿费等费用，很多学生的就学负担反而增加。面对这样的情况，助学公益类组织也开始为寄宿制学校的贫困学生提供生活费用。

另外，伴随着“撤点并校”政策，国家从2001年开始实施了“校安工程”。这就意味着国家承担了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学校危房改造等工作。公益组织在这方面的助学项目也因此有所萎缩。

（二）典型助学案例

1. 免费午餐

2011年2月，邓飞第一次得知大量在中国西部农村学校就读的孩子吃不上午餐。很快，他联络500多名记者、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开展“免费午餐”项目，号召每天捐赠3元钱，为贫困地区儿童提供一份午餐。短短两个月之后的4月2日，“免费午餐”微博上线，正式启动，并开始公募。项目启动之后，迅速得到媒体、企业、公众人物及其他各界捐款者的响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筹款已经突破千万。

网络媒体在“免费午餐”项目的启动、筹款、实施、监督等各个环节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就筹款环节来看，微博信息的转发成为“免费午餐”项目进行传播和募捐的重要方法。大部分捐款者都是通过微博了解并参与“免费午餐”项目的。同时，“免费午餐”借助互联网零售平台，在淘宝网开店，在线出售标价为3元的虚拟产品。同时鼓励网友利用微博等网络平台拍卖自己的闲置物品。此外，互联网募捐也是“免费午餐”的亮点。2012年6月1日，百度联合60万家合作伙伴发起“百度·免费午餐公益一小时”活动。当天上午11点至12点，网友在专题页面中为贫困学童写一句祝福，百度就会以该网友的名义，向贫困学童捐出一份午餐。一个小时内，百度捐出360202份午餐。在项目操作环节，“免费午餐”也引入了制度化的微博监督机制，按照规定，参加“免费午餐”项目的学校，在申请的时候就要开通微博，在项目实施后，要随时更新项目的实施情况，以便让社会各界能够监督“免费午餐”项目在当地的实施。

应该说，网络本身就具有开放、透明、迅速传播、大众参与等特征。在多个环节引入新媒介，使得“免费午餐”项目探索出了“发现问题-发布需求-大众参与-社会监督”的项目操作模式。这个模式使得“免费午餐”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得成功，也使包括邓飞在内的志愿者可以针对其他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复制这一模式。因此，我们会发现，免费午餐的志愿者们随后又转战到了为贫困地区学生提供衣物和生活用品的“暖流计划”等其他项目当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免费午餐”通过网络媒体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关注，它也推动了民间行动与政府政策的一次对接。“免费午餐”项目开展三个月后，2011年7月，国务院决定在2011年秋季学期启动贫困县、民族县农村免费午餐试点工作，26万学生受惠。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即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这项政策普惠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受惠。“免费午餐”项目成为民间探索引领国家行动的一次范例。

然而，也正是因为“免费午餐”项目高度依赖网络媒介，高度重视社会公众的感受，在项目操作的过程中，也会遇到问题。具体来说，“免费午餐”对学校的要求太高，不仅要求学校投入人力每个工作日更新微博、提供收支状况、提供餐人数等数据、回应微博上的质疑，还要求学校承担超支部分。这样一来，学校就缺乏长期坚持实施项目的动力。项目虽然在短时间内非常成功，然而却面临如何持续的问题。

2. 春苗营养厨房

2001年开始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催生了大量的寄宿制学校，也带来了住校生营养不良和吃饭难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一问题，2011年开始，安利公益基金联合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发起“春苗营养计划”，在安利公司的运营区域的省份开发实施了“春苗营养厨房”项目。至今，已经建成754所“春苗营养厨房”。

“春苗营养厨房”项目主要为学校的厨房提供硬件设施。在确定采购厨房设备之前，会对支持学校进行逐校考察，以确定支持的内容，这就优于“一刀切”的厨房设备支持项目。值得注意的是，捐赠合格、先进的厨房硬件设施仅是“春苗营养厨房”项目的一个环节，该项目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营养膳食知识的普及和食堂管理员的培训。每一个“春苗营养厨房”都会配备儿童营养手册、厨房挂图、培训教材和教学参考这四类资料。每一个“春苗营养厨房”的食堂管理员都要经过安利基金会组织的培训。这些步骤能够比较好的保证硬件厨房充分而合理的使用。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春苗营养厨房”特别注重利用关工委系统，使得关工委儿童研究中心、中国关工委、各省关工委、各项目市关工委都参与到了项目的不同环节之中。譬如：中国关工委儿童研究中心负责项目的具体运作和管理。各省关工委帮助项目选定合适的县市，各县市的关工委联合当地政府，又能够帮助项目选定合适学校。在“春苗营养厨房”投入使用之后，地方关工委还能够起到层层监督的作用。

用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来挑选项目点，比较方便快捷。在实施过程中也较少遇到阻力，而且便于政府协调各类资源，不会和其他项目发生冲突。但是，由于没有采用自下而上的自愿申请机制，如何确保项目实施的学校就是那些特别有需要的学校，就成为了问题。

3. 爱心包裹

2009年4月26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邮政合作，启动了“爱心包裹”公益助学项目。该项目旨在促进贫困地区小学生就学学习条件的改善。“爱心包裹”分为“学生型文具包”、“学校型体育包”、“学校型音乐包”几种。捐赠者可以直接到县级以上的邮局，填写单据，直接捐赠“爱心包裹”。此外，捐赠者不仅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选择不同类型的包裹，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受助学生的性别和地区。“爱心包裹”项目仍旧延续了传统的“一对一助学”的模式，在捐赠“爱心包裹”以后，捐赠者可以立刻受到带有受助者姓名的回执，之后还会受到受助者寄来的明信片。这种“一对一”的助学形式，保证了项目的透明度，也提高了捐赠者对于“爱心包裹”项目的体验和信心。

从项目设计的角度，“爱心包裹”不仅向小学生提供一般常规文具，更把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教育的理念贯穿到“爱心包裹”的项目设计之中。针对农村学校缺少美术、体育、音乐等课程训练的情况，“爱心包裹”在设计上特别重视补充这一部分的用品。在最普通的“学生型文具包”中，也添加了包括油画棒、彩色铅笔、12色水粉笔、绘画本在内的美术用品，鼓励孩子探索自己在美术方面的才能。

“学校型音乐包”和“学校型体育包”更是力求为学校的体育文化教育提供物质资助。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爱心包裹”项目在操作过程中高度依赖邮局系统的参与。全国3.6万个邮局网点全面接受捐赠，让公众参与变得非常方便和快捷，使得这个项目能够迅速在全国铺开。应该说，“爱心包裹”项目是成功动用了体制内部资源的助学公益项目的典范。

4. 阳光书屋

阳光书屋乡村教育信息化行动是以平板电脑“晓书”为依托，为欠发达地区学生提供优质学习资源的助学计划。2012在北京注册为民办非企业机构。2011年开始，“阳光书屋”开始在甘肃省武威市所辖的两所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学校进行试点，捐赠1000台“晓书”平板电脑给学校的师生，建立学校内的局域网络，上传自主开发或第三方支持的教学软件，并跟踪他们的使用情况，收集软硬件的改进需求。2012年，“阳光书屋”把试点学校拓展到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的两所乡村学校。

目前，大部分农村助学项目着眼于基本生活需求和基本学习条件的改善，“阳光书屋”则着力于把最先进的技术，带入农村学校学生的学习生活中，这种项目理念和项目设计无疑非常值得关注。先进的信息技术能够保证孩子们拥有一个稳定的获得优秀教育资源的平台，“阳光书屋”的使用，不仅能够开拓孩子们的视野，让孩子们接触到新鲜事物，激发他们的兴趣，引导他们自主学习，更为重要的是，它让农村环境中的学生接触到先进的技术和科技产品，提高他们的自信心。这不仅对

他们的学习生活有积极影响，对于他们的人格养成，也会有正面的作用。

此外，“阳光书屋”的可取之处是，它超越了以往那种单纯的硬件捐助项目，并非以物质捐赠为项目的终点。相反，捐赠“晓书”平板电脑和互联网设备只是“阳光书屋”项目的开始。“阳光书屋”更为核心的部分，在于对平板电脑中那些自主开发的教学软件的使用。为此，“阳光书屋”开发了阳光书包、阳光提高班、阳光教师平台、阳光管理器等。这些软件的推广，是“阳光书屋”项目能否成功、是否值得推广的关键。

“阳光书屋”的优势也为其带来了问题。恰恰由于项目并非一次性的物质赠与，还附带教学过程的改进，就和现有的应试教育体制存在一定冲突。在现有的大环境中，“晓书”是否能够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是它能否被更多农村学校接受的关键。

5. 麦田计划

麦田计划成立于2005年，并于2010年注册成立“麦田教育基金会”。和许多专业从事某一单一助学项目的组织不同，麦田计划的助学项目覆盖了求学费用支持、学生生活条件的改善、就学学习条件的改善、校舍支持这四个领域，对需要帮助的适龄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全方位的支持。依据政策环境的变化和当地需求的差异，麦田计划在各地的项目重点也不同。值得注意的是，麦田计划的各类项目并非截然分开，而往往是联系在一起。譬如，它的助学金项目就是与第二课堂的推广结合在一起。在针对一个班级整体进行助学金发放的同时，麦田计划也在该班级推广其创新性的教学实验。这样一来，麦田计划的助学项目就环环相扣，具有了研究和推广的意义。

作为专业并长期从事助学工作的公益组织，麦田计划还特别重视动用志愿者的力量。在麦田计划操作实施的各地，都有广泛的志愿者的参与，目前已经形成了超过70个志愿者团队，这些团队代表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力量，无论是发现问题的角度，还是做事情的方式，这些志愿者团队与政府组织都有着重要的区别。

（三）教育公益组织助学项目的发展趋势及挑战

1.发展趋势

整体来看，目前我国助学类教育公益组织的工作内容主要呈现如下的发展趋势：

第一，在“两免一补”、“撤点并校”和城乡互动的大背景下，求学费用支持、校舍支持等传统助学方式虽然依旧存在，但规模明显萎缩，其项目受益群体也发生变化。而着眼于学生就学条件改善和学生生活条件改善的项目不断涌现，甚至成为主流。譬如，益海嘉里助学工程、麦田计划等助学计划仍旧将建立校舍作为其项目内容，但是从事这类工作的助学组织已经不是主流。麦田计划、格桑花西部助学网的助学金的发放，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高中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助学类公益组织针对提高学生生活条件的项目，有了很多创新和成功经验。譬如旨在提高住校生就餐状况的“免费午餐”计划、青基会和多家企业联合发起的“希望厨房”系列项目、《南方日报》的“幸福厨房”项目、安利公益基金会的“春苗营养厨房”项目、陕西省慈善协会开展的“筑巢项目”，等等。再譬如旨在改善学生穿鞋穿衣问题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爱心衣橱”项目、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希望之履”项目、腾讯公益的“衣+衣”项目、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暖流计划”，等等。此外，助学类公益组织也积极开展提高学生就学条件的项目，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学校提供文具和文体设备。譬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动的“爱心包裹”项目、腾讯公益的“爱心字典”项目、“阳光书屋”计划、冠军基金的“快乐运动”项目，等等。

第二，近年来的助学项目不再满足于金钱和硬件物资的一次性捐赠，而更加重视在提供硬件物资的同时，也附带提供的软性的支持。也就是说，助学公益组织会详细设计、参与和监管项目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即使是简单的求学费用支持，也往往和教育过程的深化结合起来。譬如，青基会的“希望厨房”系列项目，就不仅仅提供标准化的厨房，还把校长培训纳入到了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以保证项目的实施效果。安利的“春苗营养厨房”项目也在提供厨房硬件的同时，根据当地食物设计食谱，把“营养配餐”的概念和可操作的营养知识带给学校，并组织督导服务队，参会监督厨房的使用。同样，“阳光书屋”计划也在捐助平板电脑、局域网服务器的同时，配备相应的教学软件，保证平板电脑的有效使用。再譬如冠军基金开展的“快乐运动”项目，不仅给学校捐赠体育器材，还组织培训体育老师、社区志愿者，参与到孩子们的体育活动当中。此外，“麦田计划”的求学费用支持项目也开始注重在提供助学金的同时，也着力在受助孩子当中推动素质教育。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新长城”计划，也是在发放求学费用的同时，附加教育过程的革新。这样的综合性的助学项目，也是未来项目设计的趋势和发展方向。

第三，志愿者的深度参与，成为目前助学领域的一个发展方向。与传统的直接给钱给物的方式不同，当前比较成功的项目，已经在项目设计、项目实施和项目监督领域，大力借助志愿者的力量，使志愿者深入到各个环节。事实上，包括麦田计划、爱心衣橱、免费午餐等众多助学项目，本身就是志愿者发起的项目，它们也高度依赖志愿者，推动项目的实施。以爱心衣橱项目为例，在衣物的收集、整理和发放的环节，志愿者就是主力。从表面上看，志愿者的深度参与，为项目开展提供了人力。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志愿者深度参与，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标志，也是助学类公益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

第四，网络技术和新媒体的运用，已经进入了助学项目募捐、实施、监督、倡导等各个环节，并将在未来的助学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一个及时更新的网站已经是各个助学组织乃至助学项目的标准配备。这几年来，新媒体技术迅速普及，给助学项目带来新的契机。微博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助学项目的开端，譬如，“爱心衣橱”、“免费午餐”等助学项目，本身就是媒体人通过微博发起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迅速响应。中这些项目在筹款的过程中，也高度依赖微博迅速有效的传播机制。同时，以“免费午餐”为代表的这类项目也利用微博透明、公开、快捷等特点，对项目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新媒体的运用本身，也是一种公益倡导的过程。许多助学组织借助新媒体平台，及时更新组织信息，发出倡导的声音。

2. 难点与挑战

第一，如何协调助学项目相关方的利益和期待，是助学项目开展的一个挑战。助学项目的开展和其他公益项目的开展一样，面临众多环节。譬如，不同的捐款者，往往对于助学项目抱有不同期待。目前，社会大众对公益事业普遍抱有观望乃至怀疑的态度。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动员捐款者的积极性，并非是容易的工作。此外，地方政府、学校、学生、家长等各方都对助学项目的形式和内容有着不同的乃至冲突的预期，如何协调这些不同的诉求，也是工作的难点。再譬如，如今的教育公益组织都非常注重助学项目透明度，然而，如何在保证项目透明度的同时减少学校作为实施方的负担，这也是助学项目开展的难点。

第二，设计有效的、有持续性的、可推广的助学项目，也是助学工作的挑战之一。由于涉及到硬件的捐助，助学项目的投入带有长期性。为了避免浪费，硬件设施的需求评估非常重要。许多助学项目捐建的撤点并校政策实施以前的校舍和其他硬件设施，有很多就已经废弃了。因此，如何保证硬件项目的利用率，也是项目设计中的难点。此外，由于当前中国农村教育环境乃至社会环境的变化非常迅速，如何分析到新的助学需求，如何设计行之有效的助学项目，持续进行社会创新，也是工作的难点。

第三，如何明确教育类公益组织的定位，也是助学项目开展的难点。义务教育是国家的强制性教育，国家负有发展教育的责任，教育类公益组织不具有政府职能，没有公权力，因此对于义务教育的发展是没有责任的，对于国家负责和规定的事项在进行助学活动时是应该注意到的一点。因此，教育类公益组织的助学角色应该是弥补政府角色的缺陷，在公权力无法或者无力顾及的角落发挥其弥补的作用。因此，公益组织的助学项目也必然随着国家教育政策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农村教育格局，才能发挥出自身的价值和作用。在法理上应该理清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责任界限，某些助学活动有侵夺政府职责之嫌疑，应加深与政府的合作，推动政府更好的履行期法定的教育建设和发展职责，使社会组织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由于教育公益类组织的助学项目往往从基层的需求出发，在个别时候，也带动了政府政策的调整。譬如，政府开始在农村推动免费午餐，开始反思“一刀切”的撤点并校政策，就与教育公益组织在基层开展的助学活动有很大关系。

二、支教

（一）教育公益组织支教项目的社会背景及发展现状

中国的教育现状是东中西部教育发展不均衡，西部山区和农村基础教育严重落后。为回应需求，来自不同的方面，都在试图以支教来切入并期望回应。

从1999年开始，团中央、教育部联合组织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每年在全国部分重点高校中招募一定数量具备保送研究生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到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学支教一年。同时，西部大开发也掀起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的热潮。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加快西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2003年，团中央、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发起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贫困县的乡镇从事为期1-2年的包括支教在内的志愿服务工作。

这些自上而下的支教行动，多停留在表层随给西部教育薄弱的地方带来一些改观。但另一方面，旧有的教师资源短缺无法短时间内根本解决，新的问题又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而大量出现。这些新问题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留守儿童问题、寄宿制儿童问题，以及这两类群体对教育的需求。同时，在各地学校硬件条件改善后的教师缺乏或教师不稳定等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在此情境下，一些民间的个人或机构开始行动起来，用自己的支教行动——短期支教或长期支教——来改变西部和偏远地区的师资缺乏和流动性大带来的教育滞后发展的问题。

在2000年后，自上而下的官方支教行动同自下而上的民间支教，借助互联网等手段集结起来。在这批支教队伍中，最早的民间组织是“希望之光”，随后大量的民间支教组织在全国范围尤其是中西部省份蓬勃发展起来。

这些支教类机构，根据支教的时间长短不一，分为短期支教、假期支教以及长期支教三类。其中短期支教的时间一般在7天到10天左右，假期支教的时间一般在20天到40天左右；长期支教的时间一般为1-2个学期。在支教的目的一定的区别，长期支教主要是为了缓解当地教师的短缺；短期支教尤其是假期支教主要是为了活跃和丰富当地学生的假期生活，并为志愿者提供实践的平台。同时，短期支教、假期支教和长期支教之间也是相互支持的。

在《2010年中国教育蓝皮书》发布会上，梁晓燕指出“教育类的公益组织最初的发展都是从对贫困儿童的资助、支教及一些相对简单的工作开始的。”近些年，教育类公益组织的发展是和这些年工作方向的逐渐转移相结合的。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部分工作做的是让孩子们上得起学，主要是农村儿童和城市的打工子弟。但是从2006年以后，随着教育资金局限问题的逐渐缓解，教育品质提升、内涵发展的需求逐渐显露出来，成为教育公益组织工作的主要方向。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教育公益组织从事支教类项目的开展存在着如下的特点：

第一，具有官方色彩的支教项目在扩散意义上比实际支教效果更显著，真正民

间、草根的支教组织是在2000年后逐渐增加的；

第二，专业化和规范化。现代支教是为针对的帮助对象进行服务，由乐善好施转为一种平等的服务，逐步走向专业化和科学化，如形成有效整合资源、解决针对性问题的工作机制，形成可复制和推广的项目操作模式等。

第三，民间支教志愿者主力是工薪白领，其次是实习期或刚毕业的大学生或留学生。除了传统的大学生志愿者外，在职人事、海归人事和优质退休教师等对越来越多的支援群体加入到支教活动中。一通“洗牌”过后，工薪族、城市白领、退休人员等支教“非主流”反而逆转，占到志愿者来源的半数以上，而以短期支教为主的民间支教组织，却陷入生存窘境。

第四，长期支教和短期支教的分化。支教分化为长期支教和短期支教，长期支教为了解决师资缺乏的问题，为了补充农村老师；短期支教更多的是大学生活动，是以丰富农村儿童的暑期生活和培养大学生的公益意识为主。短期支教并无法满足提高学生学习质量的需求。

第五，定位更加清晰，更加注重效果。如西部阳光定位在培养大学生公益意识，灯塔计划定位在建立学生与乡土的连接和精神引领等。

第六，项目的转型与创新。传统支教组织开始思考转型，如彩虹支教计划由传统支教转向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并推出资助小额支教扶贫项目。新开展的项目在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上有明显的创新，服务对象上表现为关注留守儿童、寄宿制儿童等群体，服务内容上由课内转向课外，提供农村学生素质教育、生活教育、幸福儿童教育课程等。

（二）典型支教案例

1. 短期支教

短期支教从早期的探访、随机活动，到如今定位在拓展教育内容，为学生提供艺术教育等课程。短期支教根据课程内容的不同来进行，如今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孩子开阔视野，获得快乐的假期；而支教志愿者从中体会到参与的乐趣与收获，并附带一些助学的活动。红粉笔计划以及幸福七巧板项目，就是典型的短期支教活动，而且都是媒体为社会在职人士设计的公益活动。也正因短期支教对不同对象的定位，经常被指责，支教志愿者的个人体验和收获重要，还是为孩子创作乐趣？

（1）红粉笔计划：“红粉笔计划”是雪佛兰公司与21世纪经济报道，共同设计的公益活动，希望通过号召和组织受过良好教育的商务人士到乡村学校支教，致力于帮助改善偏远地区师资力量薄弱的状况。

红粉笔计划主要是通过授课的方式，社会志愿者们根据自身的专业背景和特长，给乡村的孩子们教授诗歌、美术、科普知识等。同时志愿者们也会带领学生进行课外活动，例如组织名为“我的梦想”的主题班会，鼓励孩子们树立梦想并和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梦想。

在为期一周左右支教的同时，红粉笔计划也会为这些社会在职人士提供回访之前的乡村教学点的机会，时间在3天左右，透过家纺了解孩子们在社区和家庭中遇到的困难和成长的烦恼，并给予引导和解决的建议。

2006年启动红粉笔计划，截止到2010年底共招募来自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约300名志愿者积极参与，为全国14个省市的24所乡村小学奉献爱心。此外，2010年9月，红粉笔启动“城市教育计划”，志愿者以接力的形式，为京沪穗三地周边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的孩子送去素质教育课程。

（2）幸福七巧板：在偏远的乡村，由于教师的缺乏，大部分学校的绘画、舞蹈、音乐等课程长期处于被取消的状态。而且这些课程被作为“副科”而严重被忽视。鉴于此，普利司通公司和《南方周末》共同设计了“幸福七巧板”活动，开展形式主要是“第二课堂活动室”与“第二课堂支教”的机动组合方式，为乡村小学的孩子们带去关于想象，关于创造，关于美和幸福的公益活动。

第二课堂，是幸福七巧板为乡村小学搭建的活动室，并配备一些适合低年级学生阅读书籍、绘画、体育用品等物资，丰富他们的学校生活，增加校园乐趣。此外，幸福七巧板计划对当地的老师进行图书使用培训，经过特别培训的志愿者，将定期前往受助学校进行第二课堂的支教活动，每次支教的时间也就在3~5天。支教更多取材第二课堂里的物资，也尽量采取不用电脑、投影仪等高科技教具的教学方式，因地制宜，也避免对孩子的心理造成冲击。

2009年启动以来，幸福七巧板项目从关注乡村孩子的音体美等副科教育，陆续也在其中增加了环保知识，以及结合当地村小所在的家乡、民族等知识，用心领悟和感受家乡的美好与传统文化的魅力。

与幸福七巧板有些类似是短期支教活动，还有在广州的麦田计划助学机构，也会定期组织组织麦田志愿者、与全国高校合作、结合社会力量为山区孩子举办“麦风行动——第二课堂”活动，丰富山区学生课外生活，开拓学生视野，同时为大学生和社会提供一个与山区孩子交流的平台。比如通过讲座或互动游戏等方式，让留守山区或城郊的未成年少女了解到的青春期常识，更好地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不受侵害。

2. 假期支教

目前假期类支教组织，全国范围大概有10多家，如灯塔计划、春晖、西阳行动、萤火计划等。据目前统计的资料来看，支教志愿者主要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社会人士为辅。

假期支教，主要是利用寒暑假进行。起先是大学生等群体利用这段时间为偏远山区或西部省份的学生作主要的补课，期待提高成绩，改变命运。但后来意识与反思，农村儿童成长，而这并不是通过课程来实现，而是儿童与支教志愿者之间建立的社会关系，这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的平辈教育角色，在缺少年轻人的农村人绝对受用。同样，大学生的成长需求在其中也应该被赋予独特的重要性。该结论与短暂时间的支教无法带来改变有关联。因此，在满足大学生成长需求的基础上，加强专业和课程之外的培训，也会有助于支教的更完备。此外，支教的行动让这些儿童感受学习的乐趣，保持对学习的一种可能性，知识世界很广阔，能触发儿童成长的某种可能性。

（1）灯塔计划：成立于2001年的支教类组织，从一开始就定位在“精神扶贫”，旨在解决乡村教育的软件缺失，（学生无聊、学校的电脑被锁无法使用）以及老师的资源不足。灯塔支教的学生是初中阶段的孩子。他们认为在该阶段，招募的大学生对其影响特别重要，有助于树立起人生观和价值观。

“方向引领一生”是灯塔计划的愿景。他们希望这些农村孩子能够树立起一个更加积极的人生方向、唤起他们对学生和对生活的真正热情。他们利用寒暑假，在广州周边的偏远乡村学校开展活动，不过一开始希望让这些孩子“看到山外的精彩，追求动力”，现任的秘书长卢思歆回忆，认为这其实里面暗含着有价值观的优越，后来在课程上有所改变并提出“乡土认同”，让义工放平心态，认识到乡村的价值，如乡土认同、朋辈教育以及参与式教育等。

2004年开始发展雏形，编写一些支教的攻略小册子，涵盖各个支教点的基本

介绍、当地的民俗风貌，以及支教老师需要准备的教案。这样做的目的，希望能够将过去老义工的经验进行传承，同时也对过去几年的支教经验进行总结，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提升。尽管短期也被人诟病不少，有其不足，不可忽视，但灯塔计划仍认为“榜样的力量，不是老师可以替代的，支教老师与孩子们更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支教前，有一个较长的筹备期，主要对筛选出来的大学生支教进行培训，这些培训主要是围绕教育理念或手法上，而课程也主要是为引发学生们的热情和兴趣，等寒暑假回来后，他们还需要对他们的这段支教生涯进行一个长的沉淀期。

灯塔计划的核心则是4周的支教课程，这些课程阶段性，层层递进。不过在针对这些大学生团队的培训，更多是强调教育的脉络和目标。而对这些课程的质量控制，灯塔计划则在这几个方面，比如支教志愿者对义工、陪伴、乡土认同等概念的理解，此外有关教学的课程体系，还有教育方法和技巧，也在灯塔计划需要控制的培训内容。

此外，灯塔也有4天左右的义教，主要由在职人士参加，面对的对象则是小学生。义教的方式相对短期支教来说简单些，比如带孩子做一些团队游戏等活动。

每个支教点都有自己的特色，且这些课程是根据义工们长期完善而设计出来。比如我的家乡美，前期由支教老师与学生共同设计，后者去调查自己的家乡有哪些特色如食物、方言等，之后编写出一本小册子来。随着长期跟进和深入，这些课程也在不断深化，给学生可参与的空间也多了起来，比如设置“小导游”，让当地的学生，这也是2011年灯塔计划开始强调的小组学习，透过社区调研和社区行动，在不断的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能力，以及增强对自己家乡的归属感，如邀请城市的大众来山村旅游，而这些学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导游。

除此之外，短期支教的志愿者也会做些学生工作，家访，以及满足孩子的情感需要。灯塔计划做了这么多年下来，针对学生的评估，发现他们在自信心、好奇心以及团队意识方面都高起来，同时也更了解自己的家乡，也愿意为家乡做事。不过灯塔计划并无打算介入到体制内的教育，透过与教师的互动，以及与原有体制的碰撞，而实现更多人的改变。他们解释，灯塔计划关注人的教育，注重个体的需求，即通过短期的方式，给学生一个榜样的力量。

2008、2009年灯塔计划也组织广州专业的志愿者老师为这些中学的老师提供培训，并在2011年在广州举办了教师论坛，每个支教点都有3~5名老师参加。2013年，灯塔计划也开始了一些实验性的支持课程，希望这些大学生团队能够自我循环，学习已有的知识并将支教工作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灯塔计划也支持一些社区中心的社工在青少年打工社区做一些这方面的探索。而灯塔计划则希望更聚焦在课程的开发，以及推广上，希望更多的学校以及组织能够借鉴到灯塔10年多的经验。

(2) 西部阳光行动：2003年因对农村教育的关注，发起人尚立富在西部省份

走访一圈之后，借机在高校开展讲座。于是有高校的学生，在第二年的暑假和寒假组团想去解决农村的大问题，如辍学、补课等。这些行动就是早期的“西部阳光行动”雏形。

这些支教行动，后来在05、06年开始冷静下来，理由是对农村的改变很小。所以大学生更多是希望用眼睛去看。然而正是这些志愿者的打前站，对当地需求的了解，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西部阳光也将西部地区的幼儿教育，以及教师培训列入计划，与寒暑的大学生假期支教并重。而支教点的志愿者其作用非同小可，他们与每年五一十一回访的队长们，担任着很重要的角色，将支教项目的信息带回来，供参考决定。

2008年，西部阳光基金会加大大学生做短期支教的投入（在内涵上也发生了转变，更加侧重对大学生的公益教育），与此同时长期支教也开始进行。这时的西部阳光团队也开始反思，这些大学生到底以什么状态进入农村，才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支教的更大价值，应该是在大学生成长，对农村关注埋下的一颗种子。培训应运而生，在寒暑假下乡支教的大学生，西部阳光则加强对大学生的培训，包括自我决策、分工，自我设计活动方案等。不过并不意味着，对大学生的成长侧重，也自然减少了对农村教育的关注，同样二者仍齐头并进，只是支教对大学生的成长需求更为侧重些。

随后，多家企业或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也使得原来的寒暑假支教只对北京高校社团招募大学生，也开始面向山东、东北等地。而也相应地需要加强来自外省市的大学生骨干培训，这里既包括早先既有的拓展性课程、教学课程、自我讲课等，也包括一些大学生自我成长以及参与社会议题，如社会性别的课程。就这样，原先专为回应农村教育的支教团队，如今更多是从课程以及自我设计的角度，转化为针对大学生的青年公益教育。

另一方面，西部阳光的长期支教也将在2013年暂停。这其中既有当地的村小老师慢慢补充的缘故，也有另外一个志愿者项目驻校社工，因与长期志愿者项目有一些冲突。此外，西部阳光基金会也在重新定位自己的战略，有打算将长期支教交给其他组织来做，不过这只是想法。目前仍会由自己来做，而西部阳光根据农村需求的新变化，则会把精力重点放在驻校社工。

3. 长期支教

目前长期支教类的组织，在七、八家左右，如为中国而教、美丽中国、我们的自由天空OFS、贵州蒲公英支教营、四川好友营等。目前长期支教的累计派出地屈指可数，仅在千名以内。相较而言，政府最近几年实施的“特岗计划”，以及“撤点并校”，在短时间师资状况得到改善。而这是长期支教，无法有效真正做到替补农村老师的缺乏。

此外，一些组织逐渐转向培训当地教师而不是派遣长期支教，值得考虑，如深圳募师支教计划。除此，对长期支教的志愿者来说，如何兼顾到现有的支教项目之余，在社区以及当地的教育政策方面有所撬动，这是一个挑战。

(1) 为中国而教：2009年成立。此前发起人沈世德先生看到安徽复新学校的支教之路正在走下坡路，而且教师的流动性特别大，而学生的成绩也并未因支教而好转，转而开始反思短期支教的弊端。后他看到为美国而教的报道，希望透过成熟的支教模式，来解决中国的支教问题。于是在09年成立为中国而教（Teach Futrue China）。同样借鉴为美国而教的模式，在本土还有一家叫美丽中国（Beautiful China）的支教组织。二者共性居多，所以暂以为中国而教来讲述，如有不同之处，则在文章中单独指出。

为中国而教，一成立就奔着乡村教育师资短缺的问题而去，发展4年至今，他们不仅在偏远乡村，同样在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学校扎根，他们当初的使命和目标，则意在不同的项目中，让这些志愿者去碰撞这些教育体制的问题，以及做些尝试，而不是回避现有的教育现状。

农村学校支教项目（包含打工子弟学校），志愿者要在项目点全职支教2年。志愿者主要是来源是应届毕业生或毕业后工作2年内的在职人士。招募时间在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6月，志愿者的录取比例为10：1左右。之后经过两个月的岗前培训才能正式上岗。稍有不同的是，美丽中国在每个支教点的志愿者，有一半是说英语的外国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三分之二是直接下到乡镇以下的村小。这些村小更多是青年教师相对缺乏的地方，而且这些老师的年纪偏大，虽在语、数课上有经验，但在其他英语及其他科目上，这点存有劣势。支教志愿者的到来，能弥补这点，而且能与村小的孩子们建立哥哥姐姐般的师生关系。

近两年，随着村小师资的补充，以及撤点并校后遇到的难题，为中国而教也意识于此，于是在乡镇的中心校也进行支教。支教时承担的教学任务与当地老师一样，主科目和其他科目都教，特别是英语、科学课及音、体、美科目。不过，这与短期支教的目标越来越清楚的划分开来。

此外，他们从2010年开始，将国家的免费师范生也纳入到支教项目中来。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拟行承诺到县以及县以下的学校任教的免费师范生，希望对这项政策发挥杠杆作用，影响免费师生能下到基层去。为中国而教，愿意为这些免费师范生投入，他们相信可以培养出最了解基层的未来教育家，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2009年开始的前两年，为中国而教主要是通过和学校建立联系开始合作，对支教志愿者的支持全部交给为中国而教。但到了2011年，开始尝试与县一级的教育局合作，政府与为中国而教的资助方分别支持55%和45%。这其中与为中国而教的努力争取，以及撤点并校后的学生数量、工作量增加、高素质青年教师的迫切需求都有很大的关联。在支教点的志愿者，要遵守与其他公立老师一样的规则，接受学校的

评估。不过为中国而教每年也会有自查，内容涉及到志愿者遇到什么问题，有哪些支持的需要；对孩子们的成绩评估不是唯一标准；孩子们自我的成长对比。

此外为中国而教每两年也会做一次第三方评估。主要是考察志愿者的退出率、项目执行过程以及她/他的项目组织执行力。据肖四清介绍，除了教学，也会鼓励志愿者在当地申请1~2个公益项目来做，现在为中国而教的志愿者开展的公益项目很多。作为当初满足师资不足的使命之余，为中国而教也开始支持志愿者去一些不同背景下的支教点，比如中心校和打工子弟学校。这在机构来看，这些都是鼓励志愿者去探索有效的方式去回应农村教育问题，从而在根本上促进教育公平。

除此，支教项目的意义，还在于2年的支教生涯让这些志愿者在结束支教后，仍葆有当初的教育使命，并在未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种经历深刻，对他们有感触。据肖四清对过往四届志愿者未来职业选择的统计，选择继续在教育领域工作的志愿者占到6成以上。这也是为中国而教的另一重目标，就是支持这些志愿者的成长，综合能力的训练，如团队合作、鼓励开展项目，并与当地融合。所以，为中国而教也是一个培养青年人的项目，培养中国教育未来的人才。

(2) 我们的自由天空(OFS):不同于上面提到的为中国而教和美丽中国两家支教组织，OFS更多是依靠社会在职人士，就志愿者来源角度来看，这点又与好友营的短期支教比较相像。

OFS是从捐图书做起的，原因是乡村有这个需求，且很容易做到，也可以把志愿者组织起来。后来发现很多问题，比如学校是否有这需求，且配书能否满足需求，于是又开始在一些地方建立图书室，可又发现学生的阅读兴趣需要重新培养，同样这些图书馆的使用率也是低。至此，他们看到了一些专业志愿者在其中的作用发挥。不过图书，连同后期的一对一助学，都是配合后来的支教来做。支教从2006年开始成为了OFS的核心。在教育资源局部不公平的背景，OFS看到了村完小及村小都存在师资匮乏的现象，同样是老师年龄偏大、老师流动性大。

OFS定位在这些地方村小，提供主课支教，以及一些音体美等方面的课程。招募来的社会志愿者(工作转衔期为主)，来自各行各业，有过工作经验和教育多元的观点。这些志愿者至少在学校待上1学期，如离开后，后续的志愿者会跟进同一拨班级学生。OFS的土雪，称之为“接力式支教”。只要志愿者在其中支教，一些相关的助学、以及图书等方面的工作，很快就通过志愿者的调查需求来实现，因此又称之为立体支教。2008年，OFS引进心理测试的评定方法，希望科学的方法来评估OFS的项目操作者和受益者。但这心理干预的方式，后被用于到支教的项目点的学生身上。

OFS希望在一个项目点和一个学校，能够实现资源的整合，透过这种模式的总结和经验，让民间组织的这种量力而行的行动，尽管只有政府撬动的十分之一，但很有必要在这方面进行探索。

(3) 好友营支教：成立于2006年10月的民间支教组织，专注长期支教，为边远山区及留守农村的儿童提供持续稳定的志愿教师。这些边远山区的学校，主要集中在四川大凉山地区（有7个支教点）。在这里，有很多的“麻雀学校”，即一个学校只有一名老师，同时为几个年级的孩子开课。期间，随着撤校并点的加快，这些孩子出现上学难，以及大量辍学的现象。好友营也将支教的重点放在不易被关注到乡村小学，即撤点并校留下的学校。

好友营明确自己机构的定位，就是关注到这些留守农村的儿童教育需求，为其提供包括语文数学等主课，也有音乐和自然等副科的课程。好友营的目标是持续、踏实的教学工作，才能有效地提高各支教点的基础教育水平。于是长期为这些支教点提供持续的1~2学期的支教服务，从而最大限度保证对村小孩子教育的稳定和持续性，最好是在五年以上，让支教点孩子的知识水平从平均小学三年级的教育水平，提高到初一水平。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则是好友营没有特别要扩大支教点的规模之意，定位在更多是希望巩固已有的支教点的水平。7年来，由当年几个人组成的小团队，从当初的四川木里县，也陆续在青海、湖南还有发展为四省16所支教点，每学期80名长期支教老师的规模。前后共派出的支教老师422位，年受益孩子2800多名。

“好友营”为持续稳定支教团队，采取了教师“轮换制”。每年招募组织两批支教老师（每学期一批）。这些志愿者进行一学期（半年）或一年的支教活动，然后由下一批接替的“轮换制”。这些支教老师，主要是向社会招募而来的有过工作经验的社会人士，然后为他们提供2天的课程培训以及注意事项。没有选择暑假大学生的原因，好友营认为效果不是很好。

在通过自己招募社会志愿者进行支教之外，好友营也关注农村教育的巨大缺口，所以从2012年起，也开始尝试帮扶计划，与其他的支教团队分享经验，提供稳定的志愿者及管理、教育培训，从而支持同样致力于服务贫困、留守儿童的支教团队在支教公益的路中走下去，并最终让合作方独立进行支教运作。

（三）教育公益组织支教项目的发展趋势及问题

总的来说，国家制定了很多政策来缓解偏远地区教师匮乏，从“三支一扶”到现在的“特岗计划”，包括免费师范生计划，希望藉此来改善现状，但是都没有真正解决农村教师的匮乏问题。国家政策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否给公益组织留出了发展空间。

1.发展趋势

第一，在满足现阶段的师资匮乏等问题上，长期支教仍有必要。同样短期支教也有其价值所在，但对这些不同类别的支教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要有清楚的定位和了解，如不清楚能否回应到当下的教育需求，要作调整设计和过渡转型。所以也就归结到支教组织从准备到实施，乃至后期的评估要有专业性，在这些方面仍需加强。

第二，长期支教能够与短期支教相结合，发挥各自的优势。长期支教的志愿者负责联络自己所在的学校，或者是学区里的其他学校，将短期志愿者引进当地的社区。长期志愿者起到一个打前站的作用，再依托短期志愿者，在当地开展社区调研并实施有当地特色的需求项目。

第三，这也将打破支教类组织单一组织的教育功能片面性，与其他类别的公益组织，一道在当地社区的参与，

第四，与政府主管部门、各界公益力量广泛合作，将管理资源、资金资源、志愿者人力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公益效益最大化的模式。一些成熟的经验和模式，可通过政府或财政购买，使之可持续发展下去。

第五，一些支教类组织开发出来的支教课程或培训教材，在尊重其享受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可以实现支教类组织的对接和相互学习。面对庞大的教育需求市场，支教类组织需要结盟和合作。同样，支教类的组织也不应局限在固有的圈子中，或回避当前的教育不公平现象，还要跳出来如何与其他同类型的支教类组织，进行政策倡导。

第六，探索面对适合农村教育的课程，如贵州蒲公英支教营的农村低年级儿童安全及性别教育课程、农村青春期女孩成长及安全课程；灯塔计划的乡土认同等系列课程。

同样，也应关注的支教对象由贫困农村中小学学生开始转向留守儿童、农村教师等新的群体。在过去的支教经验基础上，尽可能地发挥当地人的才智，这将有助于这些支教项目一旦退出或结束，而这些活动能够在当地持续下去。义教的专业化，包括定位，手法，支持体系等，即管理水平的提升，将会对激发志愿者潜能，提供更有有效的服务的重要途径。

2.问题及争议

教育公益组织的支教类项目，主要的问题聚焦在短期支教。因为其缺乏一个很好的机制来确保教育公平使命能否与短暂的支教活动进行有效对接；同时，在短期支教过程中，对学生或志愿者的成长孰先孰后，也是比较具有争议的问题。

第一，志愿者团队的招募、管理和建设。支教志愿者多为在校大学生，即使有一整套的培训机制，仍不能保证义教的专业性和规范性。

第二，短期支教前期准备不足，且支教地点更换频率高。在支教前期，团队准备往往不足半月；团队的支教目标和地点变化快，有80%的团队每年更换支教地点；有56%的支教团队每次支教超过15人，造成学生少、大学生志愿者多的情况；支教的具体内容是临时决定的，有82%的团队采用的是边教边备课形式；近90%的支教大学生团队以大一、大二的学生为主，他们的社会实践经验尚浅。

第三，短期支教隐忧多，支教老师轮换制是目前支教组织普遍采用的方式。传统的短期观光式的大学生下乡支教活动，志愿者流动频繁，导致许多公益组织支教的宗旨一直没有得到切实的实施，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和推进发展。2010年“千里草助学计划”对支教的调研结果令人担忧，近73%的大学生表示很难联系到愿意接受的学校；近62%的校长坦言先前支教的大学生给学校带来了些不良影响，致使他们不再信任大学生支教；78%的受教学生为大学生哥哥姐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感到遗憾和苦恼。

第四，社会对短期支教是否能为孩子带来实行改变的质疑，对乡村教育核心问题的思考。2005、2006年时，全国曾涌现出大大小小几百家民间支教组织和小团队。但近些年来，由于不少大学生支教者对教学活动准备不够，也没有深入了解所支教学校的需求，来去匆匆，以致大学生短期支教呈现鸡肋现状。

三、教师专业发展

（一）社会背景及政策环境

作为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环节，教师培训伴随着中国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不断加强与完善。2010年，为了提高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实施了“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简称“国培计划”）。“国培计划”的实施对提高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基础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央及地方对教师培训投入巨大的背景下，教师培训的成效仍面临着诸多挑战。近三年的多项教师培训调查反映出教育体制内部教师培训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培训机制研究”课题组¹、中国教育报调查中心“中小学教师远程培训调查组”²的调查均显示培训课程的供给与教师专业成长的需求没有实现有效的对接。以培训内容为例，教师认为自己接受最多的培训内容/研修平台提供最多的课程是教育教学理论，而教师最希望自己从培训中学到的内容/最期待的培训资源是教学方法及策略。现代教育报及新浪网教育频道的“中小学教师培训调查”³中，四成教师坦言集中培训效果不如意。

2010年实施的国培计划，开拓了农村教师专业化培训的曙光。而在偏远及农村地区，教师专业发展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叠加了教师培训的问题和矛盾，偏远地区教师获得因地制宜、个性化的培训机会仍然不足。“国培计划”的实施范围比较有限，目前全国仅有18家教育部推荐的“国培计划”教师远程培训机构，这远远无法满足广大西部地区农村教师的培训需求，区域性、多元化的教师培训创新模式还有待探索。城市学校教师参与的各类培训次数均大于农村学校教师，农村学校教师的培训层次、地域也明显受限，培训成本分担的压力超过了城市的教师群体等等，因地制宜、个性化的培训服务和实践效果远未达到现实的需要。

目前，教育公益组织从事教师专业化发展培训和服务主要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教育公益组织在教师培训特别是农村教师培训方面，已经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积极探索、实践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一批教育公益组织教师专业化发展培训项目已具备推广价值。其二，教育公益组织正在逐步探索将教育制度创新融入教师专业化发展领域，在教师培训项目的设计与运行过程中，与地方教育部门、学校的合作渠道和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优化。其三，教育公益组织开发了更为丰富、系统和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开展了系统、持续和务实的资源辅助工作。与教育体制

1 陈向明、王志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培训现状调查报告》，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科研简报，2012年第9期总第73期

2 李孟华、肖人翔、王娜、夏青、王伟虹、李阳：《教师培训：接地气才有更好效果——六省市教师远程培训调研报告》，中国教育报，2013年5月27日

3 赵艳国、曹阳、郑祖伟、缪华：《教师培训怎样叫好又叫座》，现代教育报，2013年6月3日

内部教师培训相比，教育公益组织的教师专业化发展培训在合作方及培训对象的选择、培训规划、培训方式、培训内容等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其四，教育公益组织的教师专业化发展项目，从传统的学科领域培训逐步发展到乡村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等的本土化、内涵式培训，显示出与偏远地区、农村地区教师实际需求结合更紧密的特点。

（二）典型案例

教师专业发展项目来源于两类教育公益组织，一是在项目中兼顾或附带教师专业发展内容的机构，二是以教师专业发展为主要项目的机构。十余家以教师专业发展为主要项目的教育公益组织分布在北京、香港、广东、贵州、青海、四川、江苏等地，大多数成立于2006年之后；除少数专门提供教师专业化发展服务外，上述大部分教育公益组织的主要项目还分别涉及助学、长期/短期支教、儿童早期成长与发展、阅读、职业教育等。而不少以助学服务为主要项目的教育公益组织在教师专业发展项目领域，开展了各具实效的行动，其价值和作用不容低估。教育公益组织所推动的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包含教育制度创新的教师培训项目，二是创新教学模式的教师培训项目，三是短期学习、目标定向的教师培训项目。

1. 包含教育制度创新的教师培训项目

尽管包含教育制度创新的教育公益组织教师培训项目现在还比较少，但对区域教学培训模式的改变、政府服务方式的改变等具有引领性的价值。

“青葵花导师计划”——乡村教师学习、激励、成长培训项目，拓展了教育公益组织与地方教育局的合作新渠道。项目的执行方为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合作方为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寿光市教育局，甘肃省礼县教育局、成县教育局、宕昌县教育局以及甘肃省礼县、成县、宕昌县相关学区学校。“青葵花导师计划”以网络学习平台为依托，以实用型、个性化课程设计为本让农村教师学能致用；以导师制为核心，由东部地区优秀一线教师一对多指导西部农村教师。每年约70名甘肃农村教师参与“青葵花导师计划”，培训30名优秀教师组成当地教师成长计划的技术团队，有能力在项目期结束后进行自主培训。

我的家庭大学项目采取跨界合作模式，打破了教师培训的既有条块格局。好人好事(Teach For China)在河源地区，与2家教育局签约后举办“我的家庭大学”系列项目，整合深圳地区10家机构和20名以上的公益导师，给当地的校长、教师、家长提供讲座、工作坊、试点技术支持等服务。运营成本仅10余万，让超过20所学校的250名的校长和老师，600名学生/校的人员受益。好人好事NPO在提供教师专业化发展服务方面的项目还包括教育主题校长论坛、校园心阳光—国学师资培训、县级

心理辅导师资培训班等。

北京市泓德中育社会发展中心的“阿克苏双语教师能力建设”项目，与阿克苏教育部门合作，开发一套可促进辖区内教师专业发展的模式。项目建立起了八县一市的18个教育培训基地，用以承担收集网络教育资源，整合提炼本地教学示范经验，并向每个基地传输教育信息和资源。从各基地校选拔50名种子教师进行了两期专业性培训。整合编辑了一套当地适用的教师培训教材供基地培训使用，还由一线教师编写出一本适合学生使用的地方教材。

玉树州慈行喜愿会的“藏语文教师培训项目”，是其积极与当地教育部门进行申请，承办由玉树州教育局主办的玉树州藏语文骨干教师培训活动，帮助当地年轻藏语文教师进行系统培训。已成功举办了三期（每期为期一个月）藏语文骨干教师培训，包括2008年玉树县和囊谦县藏语文骨干教师培训、2009年全州藏语文骨干教师培训。

江苏省扬州市的阿福童教育学院在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的支持下，从2009年8月起对全国十七个省市，37各县区的100多所学校进行教师专业培训，到2013年8月底，一共培训8242人次，共计1986个小时，受益学生8万多名。阿福童教师培训的突出特点有四个：第一，观念、内容与技能的统一。一般培训关心的是技能，如教学设计、课堂组织、学习指导等，阿福童课程首重观念和内容的改善。如“以儿童为中心”一般看成是教学的原则。但是，阿福童教师培训强调的是价值观念，进而引入各门学科，与各种设计与指导的技能相结合，这样就把“知与行”紧密结合起来。此外，阿福童教育学院还开发了不少适合当地情况各类课程，如生涯发展课程、社会技能课程、青春期课程、公民课程、团队建设课程、理财课程、志愿者课程等；第二，强调传递与分享。每一位接受公益培训的教师都有义务去培训别人，一方面能够扩大受益范围，另一方面，阿福童教育强调只有在教别人的时候才是学的最快最好的时候，因此，阿福童教育培训的城乡普通教师中，诞生了20多名培训师；第三，培训关注每一个教师的成长，通过各类软技能培训，让参与培训的教师“在做中学”，从而使每个人都能有收获。

合作对象包括五类：地方教育局（如遵义县教育局、上海浦东、扬州市广陵区、扬州市邗江区、枣庄市峄城区、成都市武侯区等）、学校（如在贵州罗甸县、遵义县、纳雍县、江口县有20多所学校）、社区、公益机构（如为中国而教、河流-孩子、春晖大学生志愿者等）、大学机构（团委、社团等）。

2. 创新教学模式的教师培训项目

一批教育公益组织组织了创新乡村教学模式的教师培训项目，深入挖掘教师专业化发展资源，扶持乡村教师的自我成长。

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的乡村种子教师培训，形成了资源积累较为丰富、体系较为成熟的“培训者”培训和“一线教师”培训模式。中国滋根乡村教育

与发展促进会基经过连续5年的课程开发和教材编写，2年多的试点实践，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的教程，已培训了120名农村种子教师。在“培训者”培训阶段，从项目县教研员和一线教师中选拔40名左右优秀教师开展为期9天的“参与式”培训；从初级“种子”培训教师中择优再培训，帮助其成长为中、高级“种子”培训教师。在“一线教师”培训阶段，由第一阶段培养的本土教师培训团队对全县一线教师进行全面、可持续的培训。

桂馨科学课项目在帮助开展基础课教学领域，开展了系统、持续和务实的多元教师培训及资源辅助工作。它是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为支持中国乡村小学提升教学质量，完善和规范开展基础课教学而特别设立的乡村教师支持项目。项目资助乡村小学科学课教师集中培训，帮助教师改善基础知识和教学技能，提升教师的综合能力 and 专业素质；同时资助乡村小学科学课教学资料和科学课实验工具，为部分小学设立“桂馨小科学家实验室”；支持发达地区与落后山区农村学校互换科学课教师；设计制作了一套包括专家专题讲座、知识点和实验解析和优秀示范课等方面的优质视频资料。

香港乐施会在甘肃、青海开展复式课堂教学组织与管理新模式的探索。2008—2010年，乐施会出资、甘肃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主持、甘肃省和青海省的7县（区）教育部门合作共同实施“西部农村小学复式教学课堂创新模式教师培训项目”。乐施会仅2008年在甘肃、青海8个县培训复式教师约400人次，同时培训县教育局教研员、乡教管中心辅导员50人次。2011年兰州大学/香港乐施会“甘肃农村地区复式教学实践创新与理论研究”推广项目先后在甘肃省临夏自治州康乐县及定西市渭源县举行，教导主任、校长和边远地区小学教师共250余人参与了培训。

3.短期学习、目标定向的教师培训项目

短期学习、目标定向的教师培训项目是当前教育公益组织主办、承办较多的方式，其成本相对于包含教育制度创新的教师培训项目、创新教学模式的教师培训项目两类而言较低，而其运行方式则相对简单。

梦想灯塔教练计划等教师培训源于灯塔计划，一个发源于广州的面向农村教育的纯公益性质活动。2010年灯塔计划与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合作的“梦想灯塔教练计划”，旨在使乡村教师们能够使用“梦想课程”。培训的主要目的是让老师们全面了解到11门“梦想课程”，亲身感受“梦想课程”的课堂环境，一起探讨“如何上好梦想课程”。这次的培训，灯塔组织、培训并派出200多名的志愿者奔赴全国16个地区，覆盖甘肃、四川、重庆、贵州、广东共130余所中小学校，对当地的老师开展为期三周的梦想课程培训，受惠教师达2500名。

“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的倡导者是知名主持人崔永元。从2007年至今，崔永元公益基金和“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组委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七期乡村教师体验式培训活动。邀请边远地区的乡村教师，利用假期到北京或上海进行

为期十天的体验式培训，帮助乡村教师开阔眼界，接受新知，提高人文审美综合素质。项目历时5年，北京、上海2座城市，7次培训，来自中国11个省市的689名乡村教师参加了培训。

光华科技基金会的山区校长培训项目，系原及人教育公益机构举行的“中国贫困山区优秀校长国际领导力奖学金项目”。2010年及人教育从四川、青海、云南、安徽、海南等贫困山区选拔15位校长到北京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培训，到2013年已连续举行了四届。该项目以“教育扶贫”为公益使命，致力于改变贫困地区落后的教育面貌。

（三）挑战与建议

1. 问题及挑战

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整体来看，教育公益组织的教师培训项目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第一，教育公益组织在教师培训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仍是弱小。根据“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培训机制研究”课题组在全国11个省市调研的结果⁴，教师参与各级各类培训的频次人均均为6.9次，而参加商业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培训的人均次数最低，仅有0.87次；2.4%的被调查者参加国内外非政府组织（NGO）承担的教师培训。教育公益组织的教师培训项目处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边缘地位，远远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和示范效应。

第二，教育公益组织的教师培训项目自身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培训机制研究”课题组比较教师对各机构培训效果的看法，5.2%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内外非政府组织（NGO）承担的教师培训效果较好。在教育公益组织教师专业化发展培训规模很小的背景下，培训团队的专业性、培训课程的适切性、培训资源的可持续性、培训过程的规范性等还没有很好地与教师群体的需求相匹配，教师专业培训的队伍主要存在着流动性大、服务地区有限、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并且如何选拔接受培训的教师，选拔方式的科学性、选拔过程的公平性等也都存在着相应的问题。

第三，长效且包含教育制度创新的教师培训项目太少。回顾教育公益组织的教师专业化发展培训历程，一些具备探索性、创新性的项目遭遇流失、中断等状况，这与目标设计、系统规划有关，也与资源整合的能力有关。短期学习、目标定向的教师培训项目在帮助农村教师成长方面，其延展性、可持续性价值面临着较多的质疑。

4 陈向明、王志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培训现状调查报告》，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科研简报，2012年第9期总第73期

2. 对策及建议

教师在教学工作领域中承担着核心传承的职能，有效实现教师群体的自我提升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促进偏远及农村地区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和专业化教学改进，帮助教师个体的可持续发展，势必从根本上对所在学校、所培养的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更好地改善区域教育。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服务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教育公益组织教师培训，需要解决两个层面的协调问题：一是不同受训教师群体差异化培训需求的协调，二是不同培训主体（组织）功能作用的协调。

第一，不同受训教师群体差异化培训需求的协调。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培训项目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归根到底是能否准确评估、分析受训教师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既包括个体背景信息如性别、经历、职位等的研判，也包括个体对培训的认识、期待等信息收集，还包括培训结果的个性化延展反馈即受训教师成为新培训者的规划。教育公益组织需要围绕项目生命周期全过程，开展项目前评价、项目中评价及项目后评价，有效地认知、及时地协调教师的需求，激发教师改进教学的激情和参与培训的积极性。通过优化培训团队的专业性、提高培训课程的适切性、增强培训资源的可持续性、保障培训过程的规范性等途径，建立具有普适价值的培训机制和操作方法，传承好以往的经验 and 汲取不足的教训，促进乡村教育的改革，从而为孩子们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第二，不同培训主体（组织）功能作用的协调。不同培训主体（组织）功能作用的协调，主要包含、教育公益组织与企业及师范院校、政府与教育公益组织等多元机构两个维度的组织架构相互作用。在教师专业化发展培训项目中，如何建立体系化的、稳定的伙伴关系，需要教育公益组织不断地学习、思考与探索。教育公益组织与企业、师范院校等多元机构的合作，有助于整合不同领域的资源，提高项目的拓展性，增加培训设计的深度和广度。更重要的是教育公益组织在提升培训专业化的基础上，可以在政府购买服务领域进行务实的良性互动。

亟待建立有效机制，实行教师培训服务的政府购买。政府与教育公益组织之间的协同创新有助于深化以教育制度为主的创新，超越教学模式、课程等改革，对区域性的教师培训模式和教育面貌变化形成深切的影响，局部突破乡村教育困局。而教育公益组织通过优化培训团队的专业性、提高培训课程的适切性、增强培训周期的可持续性、保障培训过程的规范性等，打造富有竞争力的教师培训项目，向政府提供丰富多元的培训业务购买服务。政府购买的投入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公益组织相关项目资金来源的掣肘，维系农村教师培训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让更多的农村教师和学生受益。

四、留守儿童情感关爱

伴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迁徙、转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我国农村传统的家庭模式正在随之发生着激烈的、深刻的改变。新的家庭结构正在重建，夫妻分居、家庭成员分割、亲情疏远、观念冲突带来的家庭变化之阵痛不会很快结束，与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相伴随的留守儿童现象，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存在，处理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过程。

（一）教育公益组织参与留守儿童问题的背景及现状

1. 留守儿童的核心问题

2007年，全国妇联将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重新界定为：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17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目前，留守儿童共同面临的主要突出问题有以下四方面。

亲情失抚。60%—70%以上留守儿童长期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学习生活中的烦恼和冲突都需要独自面对，缺少与亲人交流沟通的平台，缺乏正确的渠道来释放压力等等，这些导致了留守儿童的自卑心理，导致了他们对学校生活缺乏兴趣，导致了他们的敏感、脆弱、孤僻和消极。他们把幼小的心封闭起来，很少对人倾诉，他们是心理上的弱势。

生活失育。在生理上，部分留守儿童体格生长发育指标水平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低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高于非留守儿童。在行为上，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对留守儿童的行为难以进行监督，现有监护人对他们的监护又不严，部分留守儿童在行为上的偏差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约束，许多留守儿童有抽烟、酗酒、赌博、小偷小摸等不良行为，有的甚至拉帮结派，与社会上的不良青年混在一起。更有些留守儿童触犯法律，特别是有些无学上、无事做、无监管的新“三无”们。

学习失教。由于父母有一方或双方都在外打工，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是有所缺失的。单亲监护人相对于双亲来说，更多地忙于家事与农活，往往无暇关注子女的学习；隔代监护人年岁大，精力有限，文盲率高，对留守儿童的学习爱莫能助；而他人监护认为他们只要负责好留守儿童的生活即可，以至于带来很多留守儿童学习上问题。监护人的教育监护责任基本上“转嫁”给学校，而学校、老师常常有心无力。

安全失保。一些留守儿童处于无人监管、自行其事的状态，容易侵害他人或受到侵害。留守儿童溺水、伤亡事故明显高于同龄儿童。被拐卖儿童中，流动儿童居第一位，留守儿童居第二位。

2. 社会各界关爱与服务留守儿童的整体情况

目前，留守儿童关爱与服务实践中，参与主体有：政府部门（妇联、共青团、关工委等）、学校、社区、媒体、企业（用人单位）、志愿者、家庭、国际机构、民间组织等。从国家层面看，目前由全国妇联牵头成立了12个相关部门参加的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由工作组统一协调、组织各部门协同开展工作。但是多数地方政府尚未组建这样的专题工作组。正是由于妇联工作职能的局限性与地方政府的协同的滞后性，这种组织结构造成了目前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与服务体系中“主体失真”的尴尬局面。

留守儿童关爱与服务主要形式有：调查研究、宣传推广、信息管理、经济捐助、思想教育、情感交流、心理咨询、亲情电话、组织倡导代理家长制、建对帮扶制、对监护人培训、组织“团聚”“夏令营”等主题活动，为推动和促进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政府强有力的统一的规范、引导与经济支持，使上述关爱与服务行为发挥的实际作用有限，存在以下局限与困难：

(1) 妇联、群团组织面临职能和资金困难的尴尬境地；

(2) 部门分散、协调不力，导致工作重复，资源浪费；

(3) 应试教育的巨大压力，多数学校、教师无暇顾及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

(4) 对学校期望值过高，甚至把全部责任推向学校，造成学校压力过重，甚至偏离教学重心，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和教育质量；

(5) 学校资金、设备、场地、专业师资（如心理咨询教师）短缺，无亲情电话、无心理咨询室、无专业心理咨询、无专业保育师资、无文化娱乐室，无安全保障；

(6) 社区活动资金、资源、设备严重缺乏，机构不健全（共青团、民兵、计生、妇女协会、老人协会等已名存实亡），社区留守人口妇女、老人化问题突出。建立心理咨询室的较少，已有心理咨询室的软、硬件建设尚不达标，无法正常运转，还有的存在活动设计与程序不规范、不科学性，很容易导致留守儿童问题“标签化”，促使留守儿童产生逃避或抵触心理，严重影响被咨询者数量与质量；

(7) 媒体报道虽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它在动员、组织社会力量、调动社会资源方面缺乏约束力；

(8) 多数用人单位追求利润的冲动压倒一切，根本无暇顾及留守儿童问题，大型企业的关爱行动，对绝大部分受聘于小公司、小企业的农民工子女很难受益。

同时，为满足留守儿童需求而出现的家长学校、“代理家长”、“职业代理家长”等形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各地家长学校办学条件差异很大，很大部分只有一块牌子，基本上无教学资源、无师资、无场地、无经费来源、活动形式单一、活动频率低，导致家长或监护人受训参与程度偏低。还有的培训内容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使参训者受益度偏低。

一些地方政府把代理家长的爱心与奉献当作“工作要求”列入干部年终考核内容，导致权利与义务的背离，使“代理家长制”义务难以维系；还有的家长和代理家长之间权益关系模糊，把交纳学习、生活费用之责推给了“代理家长”。特别是其中的村社干部，大多忙于自身工作，很难真正履行代理家长职责，使代理家长制名存实亡。由市场主导，民间自发的经营活动如“职业代理家长”、“托管家庭”等，因多数家庭无法承担代理费用而发展艰难，而且代理家长难以代理亲情，在治理由于亲情缺失引发的“农村留守儿童综合症”上，收效甚微。

（二）留守儿童关爱公益项目典型案例

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既是生理性弱者，又是社会性弱者，同时还是自然性弱者。加强对留守儿童群体的救助，其责任不仅是政府的，也是全社会的。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种公益组织可以而且应当深入农村留守儿童群体，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的救助与服务，让同在蓝天下的他们健康成长、快乐生活。公益组织成员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中，不仅能够表现一种能震撼其心灵的志愿精神、奉献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还具有无时空阻隔的面对面、富有情感等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家庭关爱、教育、互动的不足，能够让留守儿童感觉到他人、社会对他的关心、爱护，去除被社会忽视、边缘化的不良体验，从而促进其身心的健康成长。

根据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统计的《教育公益组织名录》，目前从事关爱留守儿童的公益组织约有十几家，约占到统计名录的5%。这些公益组织关爱留守儿童的工作内容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三部分。

1. 成长陪伴

农村留守儿童本应得到亲情的陪伴，却因家庭条件等原因父母远离自己。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情感缺失，弥补孩子成长的人生指导，许多公益组织在校内外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项目活动，以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驻校社工项目和湖南禾湘文教促进会的“农家学舍”为典型案例，前者在学校中通过驻校社工的方式帮助学生解决情感需求和各样问题，使孩子在学校快乐成长；后者通过养成教育、知识传授和能力培训，打通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联系，并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购买服务。

“陪伴成长·驻校社工”项目由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于2011年发起，旨在通过成长陪伴的方式，解决农村寄宿制学校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问题，帮助其全面发展。2010年，西部阳光基金会工作人员调研甘肃省陇南市部分偏远山区寄宿制学校时发现，寄宿制学校学生的习惯养成、营养健康、学习兴趣特别是心理健康都存在的很大问题，儿童对学校厌倦，对同学关系感到处理困难，急需要能够陪伴成长和解决心理困惑的老师和成长伙伴。这触发了他们开设“陪伴成长·驻校社工”项目的想法。

2011年3月，该项目正式启动，并确定该项目的宗旨为“陪伴农村寄宿制学校留守儿童成长，协助解决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各种心理问题”。该项目引进专业的社工陪伴农村寄宿制学校孩子的成长。通过各类校内外的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协调学生与父母、同辈、老师之间的关系，并对特殊的个体进行个体辅导。该项目社工培训系统完整，便于推广；团队能力建设突出，人员流失极少。

驻校社工项目开展以来，直接服务儿童2000余人，间接影响家庭1000户，并对近30个社区有过帮助与支持。在入校服务期间，对当地教育产生良性影响，当地老师普遍接纳，并应用社工工作方法到自己的课堂与教学当中去，使学校氛围变的活跃有生机；学校领导对社工认可度较高，并对学校的辍学率有所影响，使儿童对学校认可度大大提高。

“农家学舍”由湖南禾湘文教促进会于2009年3月7日正式运行。禾湘文教促进会的宗旨是：“文教促和谐，寻求城乡统筹两型社会发展之路”；口号是：“用未来的眼光呵护留守儿童的今天！”；愿景是：“惠与而非施与，启迪留守儿童成为未来社会生力军”；工作方针是：“党委指方向、政府给政策、民间出力量”；工作路线是：“自觉自愿，城、乡志愿者携手，在基层政府支持下，依靠和团结群众，壮大草根力量，共建和谐社会”。

“农家学舍”是该会的核心项目，它不同于常规的制式化教育，是学校教育外一种新方式的有益尝试。其服务对象以留守农村的少年儿童为主，通过打通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联系，对留守儿童进行养成教育、知识传授和能力培训，以传统蒙学的《弟子规》、《增广贤文》为基本教材，讲授“自我认识”、“人已关系”和“人与自然”的认识。授课基本模块包括德育教育（《弟子规》、《增广贤文》等传统蒙学和公民素质教育题材）、环境教育（生活中的环保、勤俭节约、节能减排、美丽乡土）、艺术教育（诗词楹联、音乐、歌舞、书画）等。授课方式灵活轻松，书籍、挂图、音乐、影视作品、习作交流形式不拘。兼顾家长的需要，通过激活传统文化价值观，传授现代生活的智慧，提高未来适应生存的能力，并使其有机融合，提升现代乡村文明教化水平。“农家学舍”也有别于一般的农村支教，其鲜明特色是组织城市大学生志愿者长期深入乡村，携手乡村志愿者，担负乡村文化发展的使命，挖掘乡村传统文化底蕴，注入城乡统筹两型社会建设的新鲜血液，再铸乡村文明进化的路标。

“农家学舍”自2009年3月7日第一个教学点正式运行以来，直接服务对象达到15000余人次，志愿者的总服务时间长达12000小时！同时，志愿者主动融入龙洞村的新农村建设，积极参与民间故事收集和《新村之歌》投稿、编辑、诗友培训、诗友联谊会等工作，数次为敬老院老人举行文艺慰问演出，开展“国庆六十周年爱国电影巡演周”活动，对全村老人进行医疗健康咨询，受益群众达到8000余人次。

2.心理指导

由于长期缺乏亲情、教育和监管，未成年的农村留守儿童在心理方面均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开展专业性的针对性强的心理指导或矫正已势在必行。“爱在蓝天下志愿者协会”在小学校里成立“留守儿童之家”，每个周末给孩子们上美育课，给孩子和进行心理辅导；“我们的自由天空”通过设立中小学生学习心理健康档案，发现他们潜存的心理问题，及时矫正。

四川资阳市“爱在蓝天下志愿者协会”成立于1999年3月，关注特殊儿童（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残疾儿童、问题儿童、贫困儿童等），促进社区综合发展。从关爱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入手，辅以特色活动的开展，填补了以往“重物质轻心理”的教育缺陷，具有独创性；注重提升监护人的教育水平，具有首创性和长效性。摸索治理“留守儿童问题”的模式和方法，在相似地区推广，帮助更多的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我们的自由天空” (OurFreeSky, OFS Volunteer Organization) 公益助学项目组是由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人，由“我们的自由天空”广大爱心志愿者联合发起的，广泛吸收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志愿者组织，组织以网站 www.ourfreesky.org 作为公益、助学帮困活动开展及志愿者间交流的共同平台。网站创立于2006年3月，至今已有20000余名注册会员。项目旨在建设贫困山区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档案，及早发现和干预危机群体，帮助他们在困境中更为乐观、向上的学习和生活，避免导致日后学习、行为以及身体和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促进德智、身心的和谐发展。希望通过在滇黔桂湘OFS助学点的心理调查结果的纵向比较，在实践中探索对贫困山区中小學生及教师心理健康进行有效干预的方法和途径。

3. 书信交流

主要是通过一对一书信来往、夏令营、项目地走访等形式，构建志愿者与留守儿童间的长期朋辈心灵交流的平台，引导留守儿童形成健康、阳光的生活态度，培养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倡导社会对留守儿童的正确认识和广泛关注。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的“蓝信封”项目、美新路公益基金的“大朋友”项目是这一类的典型案例。

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简称“蓝信封”，始于2008年3月，经过四年的发展，于2012年11月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蓝信封覆盖广东高校中的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3所学校中的6个校区，共有6支队伍。机构的使命是陪伴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愿景：每一个留守儿童在社会的关爱下健康成长。

“蓝信封”选择初中生这个常被忽略而最需要聆听的群体，通过在当地学校设立蓝信封信箱，提供贴好邮票并写好发送地的信封，方便留守儿童随时把自己的困惑寄出；而在高校由心理学教师培训专业的蓝信封大使（公开招募志愿者）真诚回信；同时寻求当地学校对此的关注，为留守儿童组织相关活动；另一方面，利用免费为工厂组织文体活动的机会讲述留守儿童故事，向外来工宣扬“一星期一电话”的理念，也让工厂多为外来工考虑这一问题。和一般的扶贫、教育项目相比，本项目更像一座桥梁，而留守儿童和外来工，便是桥的两端。而“力所能及，聆听他人，充实自己”，就是对蓝信封大使的最好总结。

该项目注重心灵层面的交流：反对说教，提倡在“真诚、平等、分享”的基础上与留守儿童交朋友，互帮互助，共同成长；注重参与式发展：注重留守儿童和大使双方的体验，即双方自己参与这一书信往来的过程，蓝信封只负责通信维护，即头一年的收发信和提供必要的咨询、开展必要的培训和分享活动。

“大朋友项目”是美新路公益基金于2003年推出的一个志愿服务项目，该项目源于1904年由考特(Ernest Coulter)先生在纽约市发起“大哥哥大姐姐”，40位大哥哥大姐姐带领40位需要辅导的青少年，帮助其矫正社会行为。

“大朋友”的服务对象为初中生，他们或者是国家级贫困县留守儿童，或者是跟随父母打工的城市流动儿童。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都有自己的心事和烦恼，渴望有一个大朋友陪伴自己走一段成长的人生道路。大朋友项目是志愿者与同性别的小朋友1对1的结成对子，每月至少写1封信、每年至少见面1次，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交流，彼此传递关爱、建立友谊，为小朋友打开一扇充满爱的窗，追求和树立更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大朋友需要承诺至少服务1年。

“大朋友”的定位：1、大朋友志愿者将成为：陪伴者、倾听者、人生道路的分
享者。2、大朋友志愿者将努力成为：真诚平等的朋友、爱的传递者。3、大朋友
志愿者不是：德育老师、心理辅导员、监督者、说教者、物质资助者。

（三）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的发展趋势及建议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服务体系，健全动态监测机制”的目标与任务，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多元主体协同合作。

1. 公益组织能有效弥补政府失效

作为农村留守儿童救助的两大提供主体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其资源优势各异，二者的协作能够更好地发挥救助的合力，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有效协作机制的缺失，这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中存在着资源整合不足、资金利用率低、协作空间狭小以及协作手段单一等问题，这主要是由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制度法规不健全以及公共意识缺乏所致。因此，要建立一种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协同合作、资源共享的联动解决问题的机制。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农村公民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

但是，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在提供社会福利、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还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还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经验、手段和技能，特别是在

解决农村经济滞后、法治失范、道德滑坡以及人口膨胀和人口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农村社会良性运行受阻条件下产生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上经验、能力尤其不够。而各种非政府组织有较强的使命感，与基层联系密切，通过多种服务，能够灵活、有效地满足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各种需求，从而弥补政府在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救助上的失效现象。

2. 公益组织可为的空间

由于长期缺乏亲情、教育和监管，未成年的农村留守儿童在情感、心理、道德、行为习惯等诸多方面均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为了留守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外界的专业性的介入和救助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这是公益组织应当也是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公益组织可以动员和组织各行各业的有经验、有抱负、有志向的人们，进行专业性的饱含关爱的辅导、教育和服务。

第一，农村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陪伴服务。据调查发现，在单亲监护、祖辈监护、叔辈监护或自我监护中，均存在严重的放任现象，特别是在节假日离开学校的日子里，农村留守儿童的行为更加自由。要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监管和引导，营造家庭般温馨友爱的氛围，促进其健康成长。公益组织可以成立针对留守儿童的“托管中心”或“亲子园”。非政府组织可以争取当地的退休干部、退休教师、假期回乡的大学生或其它有条件的人员担任工作人员，在平时特别是节假日，集中对留守儿童进行监管，同时提供娱乐学习及生活方面的指导与服务。同时，要建立留守儿童档案，详细记载留守儿童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及监护人联系方式，对留守儿童的思想、品行、学习、生活等情况认真观察并有记录，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

第二，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咨询、指导、矫正服务。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心理问题十分严重，开展专业性的针对性强的心理指导或矫正已势在必行。公益组织可以在农村以乡为单位建立心理咨询、心理辅导中心，联系心理专家、优秀教育工作者、大学教授设立心理咨询工作日，对留守儿童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导。也可以组织成员深入农村学校、家庭，与留守儿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寓教育、辅导于无形之中。另外，还可以与学校特别是寄宿制学校联合主办专题讲座，向学生传授心理调适的方法和途径。

第三，农村留守儿童维权服务。农村留守儿童权益受损严重，主要表现为受照顾权不到位、生命健康权难有保障、受教育权被大打折扣以及发展权受到制约等诸多方面。当一个不能自救的弱势群体即留守儿童群体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时，外在力量的支持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公益组织可以向留守儿童发放教育材料，宣传法律基本常识，宣传法律保护意识，对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权益和造成人身伤害、虐待及触犯刑律的，组织法律援助和帮助留守儿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3.公益组织需加强自身建设

公益组织凭借自身的优势，在农村留守儿童情感关爱问题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公益组织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和满足其多元化需求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公益组织应当注重自身建设，并积极寻求政府的理解与支持；政府部门应当积极支持、引导公益组织的行为，从而真正实现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

第一，更多的沟通了解。谨防 NGO 流动儿童教育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重叠，应与流动儿童学校、家长保持良好的沟通。如果教育援助的方式是为公立小学就读的留守儿童提供资源，信息和服务，那么 NGO 应对留守儿童所在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应主动到留守儿童所在的学校了解孩子们的学习情况，由此来制定他们帮扶，干预的计划；如果 NGO 教育援助的方式是开办学校，那么学校以其独特的地位，可以在城市化进程和留守儿童社会整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能有效地促进留守儿童与社会资源的良性整合。

第二，更完善的志愿者机制。谨防 NGO 弱组织性、志愿者的流动性与留守儿童教育的长期性、稳定性矛盾，应充分了解流动儿童的心理特征及需求，建立良性的志愿服务机制。城中村流动儿童是个边缘的、脆弱敏感的特殊群体，于是对志愿者产生了更严格的要求。需对 NGO 志愿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使得对留守儿童教育的介入须持有慎重科学的态度，需要他们具备更多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于是在挑选志愿者的过程中，也要更加谨慎，宁缺勿滥。另外在志愿者专业知识和志愿者管理方面，也期待更加完善。

第三，更稳固的社会网络。协调好 NGO 的非政府性、外来性与当地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当地居民的关系，增进彼此合作，是 NGO 对留守儿童教育帮扶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本着大教育和合作的精神去发现和其他社会群体的需求也会给留守儿童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起色。

五、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社会融入与发展

（一）社会力量参与流动儿童教育的背景与历史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日益突出，大城市中开始出现专门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场所—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在创办初期多半处于非法的地位，由于没有任何政府的资助，完全依赖低廉的学费来维持，采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方式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学校在初始阶段，无论在校舍还是师资方面条件都十分简陋，在政府出台有效措施之前，亟需来自社会的支持。

社会力量参与流动儿童教育，最早由城市高校学生社团发起。大学生志愿者以教师的身份进入课堂，一方面满足了学校的师资要求；另一方面减轻了学校需承担的教师培训、教师工资等负担。首都师范大学晨曦社，从1997年开始在打工子弟学校支教，是北京第一个开展打工子弟学校支教活动的高校学生社团。随后，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协会分别在1998年和1999年加入打工子弟学校支教的行列。

但随着大学生志愿者数量的增长，支教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例如大学生缺乏课堂教学经验、课堂秩序混乱、教学效果不理想、缺乏稳定性等，一些打工子弟学校不愿将主课交予大学生志愿者承担。高校学生社团也逐步将重心从课堂授课转向了课外活动，主要以在课后、周末开展兴趣班、特长班以及游戏等形式为流动儿童提供教育支持。为了提高专业性并保持活动的稳定性，一些学生社团开始与NGO合作，由NGO提供资金和其他支持，并对大学生进行指导。例如世界宣明会与北京地区高校合作，由宣明会提供经费支持，高校志愿者则负责具体活动的开展。2002年以后，大批高校进入这一领域，几乎每所高校都有志愿者或社团在打工子弟学校支教，这也是目前最主要的大学生参与流动儿童教育的形式。

随着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的发展，一些社工专业的学生在支教之外发现了新的教育支持形式。他们更加关注流动儿童的全面发展，通过开展班级活动、社区活动、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等，尝试利用所学的知识与方法协助流动儿童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和困惑。除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以外，还请高校负责老师和社工系的教师担任“督导”。教师的加入改善了志愿者稳定性差、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的缺点，提高了志愿队伍的稳定性；同时，有些教师将社工课程与流动儿童的服务相结合，保证了服务的持续性和长期性，避免了短期接触给流动儿童群体带来的副作用。

（二）公益组织参与流动儿童教育的典型案例

2000年以后，随着流动儿童数量的急剧增长，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公益组织在这一时期大量进入流动儿童教育支持领域，起初以进入打工子弟学校为主，后期逐步进入流动儿童社区。根据活动内容，公益组织开展的流动儿童

教育支持项目主要可以分为资源链接、课程支持以及课外活动、教师能力建设以及社区公益项目四类。

1. 资源链接类项目

相比政府的刚性分配，公益组织在资源配置上有一定的灵活性，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源转移以及资源平台建设，公益组织有自己的优势。针对打工子弟学校“因陋就简”的办学条件，公益组织提供了多种渠道的资源支持。

(1) 教学设备捐赠

一些公益组织，以及部分企业、事业单位通过公益项目的形式，为打工子弟学校捐赠教学设备，尤其是电脑室、图书室等打工子弟学校自身无力提供的资源，这对打工子弟学校的硬件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协调和后续的监管，物资捐赠常带来分配不均的问题，例如一些学校重复接受捐赠，而另一些学校却少有人问津。另外，部分学校通过变现等形式将无后续利用价值的设备变卖或者挪作他用，也使公益项目的效果打了折扣。因此，越来越多的公益项目转向对学校的能力建设，以及直接针对学生的资助。

(2) 助学金

一些公益组织通过助学金或者奖学金的方式向流动儿童及打工子弟学校提供支持，例如希望工程、春苗助学金、雏鹰奖学金等。

(3) 教师资源整合

一些公益组织以建立资源平台等方式为打工子弟学校提供志愿者或者教师资源，例如为中国而教、I DO基金，以及红粉笔项目等通过整合社会资源为打工子弟学校提供音体美教师，支持流动儿童的艺术教育。

(4) 公益办学

开展公益办学项目的多是一些资金实力较雄厚的基金会，其中最知名的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新公民学校”项目。该项目希望在政府支持下，探索出一条社会捐资、公民参与、民办公助的办学新路子，为更多的企业和公众参与农民工子女教育提供借鉴，为和谐社会建设作贡献。新公民学校每所资助金额为150万至200万元人民币，现已建成新公民学校5所，覆盖2000余名打工子弟。

2. 课程支持以及课外活动类项目

公益组织参与打工子弟学校的课程支持后，改变了之前志愿者承担课程不稳定、授课内容零散的局面，有些组织可以系统、长期地为打工子弟学校提供相应的课程支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打工子弟学校教育资源匮乏的缺陷。按照内容来分，公益组织提供的课程支持可分为艺术教育、自然教育、阅读项目、冬夏令营、社会融入教育和职业教育六类。

(1) 艺术教育

打工子弟学校因办学条件所限，主要以完成主科课程为主要教学目标，艺术教育往往成为他们的教学中的薄弱环节，甚至长期缺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公益项目为打工子弟学校提供短期（以学期为单位）或者长期的艺术教育公益课程，弥补打工子弟学校教学资源的不足，让流动儿童有机会接触艺术。公益组织在打工子弟学校开展的艺术教育主要通过举办活动或者提供艺术资源的形式进行。例如花旦戏剧坊，致力于通过戏剧的教育激发（流动）儿童的潜能。其他还有以音乐、美术、表演、摄影等艺术类课程形式为流动儿童提供的艺术教育支持。

（2）自然教育

少有打工子弟学校开展自然教育类课程，一些公益项目在这方面提供了相应的资源补充。主要包括环保类课程教育，涉及能源节约、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等主题，还包括一些与大自然直接接触的校外活动等，旨在激发流动儿童参与环保、了解大自然的兴趣。这方面的代表项目有农民之子流动儿童自然教育项目、自然直有流动儿童学校环境教育项目等。

（3）阅读项目

打工子弟学校很少能像城市公立学校那样拥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对这样的情况，一些长期从事阅读研究的公益组织联合NGO的资源平台，为打工子弟学校提供图书捐赠或者阅读课程的资源支持，以期弥补流动儿童在课外阅读与课外知识获取上的不足。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天下溪—快乐小陶子流动儿童图书馆、香港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儿童阅读项目等。

（4）夏令营/冬令营

由于父母在城市工作繁忙，大多数流动儿童在寒暑假期间无处可去。以夏令营或冬令营的形式为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提供一个学习、娱乐与交流的活动机会，也是最近几年公益组织中比较常见的活动方式。通过将流动儿童带出校园，与其他社会群体及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相接触，借助假期课程安排灵活、多样等优势拓展流动儿童视野，促进流动儿童的全面发展。

（5）社会融入教育

城市融入是流动儿童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并且城市生活能力以及城市融合能力也是影响流动儿童未来发展的重要能力。随着流动儿童群体的扩大，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公益项目的关注点也从教育公平延伸到了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方面，开始关注流动儿童自身的能力建设，例如成长教育、体验式的“城市大冒险”模拟训练和实地探访等，帮助流动儿童了解城市生活规则、学习城市生活技能、与城市人进行交往，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心理控制感，提升了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的能力和勇气。这一类项目的典型代表是歌路营的成长教育。

（6）职业教育

由于城市教育政策的限制，流动儿童在初中毕业之后很难进入城市地区的高中就

读，他们或是选择回老家继续读高中，或是留在城市进入职业学校，升学无望的则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职业教育对于最后一类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流动儿童职业教育的形式主要有非正规短期培训、基金会资助办学，以及提供相关职业培训项目和信息等。

未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准备的非正规短期培训主要由一些草根NGO承办，主要提供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时间通常为半年到一年，以低成本的课程为主。除必要的技能外，也介绍一些法律、劳工权益相关的知识。一些社会组织结合自身优势，还开展社会工作、劳动关系等课程。这种职业培训的突出特点是周期短、灵活、成本低、见效快，有些项目直接与用人单位合作，例如CMC的职业教育项目，确保了培训的有效性。

另有一些公益组织开展职业生涯规划项目，例如NWETC针对初中生的职业教育培训“我的未来我做主”、歌路营针对义务教育后阶段的流动儿童职业生涯教育项目“职业天空”、救助儿童会的“成功之技”项目等，为流动儿童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打下了基础。

3. 教师能力建设类项目

流动儿童教师队伍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流动儿童教育的质量。随着公益项目在流动儿童群体中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开始意识到教师队伍建设对提升打工子弟教育质量以及促进流动儿童健康成长的意义，因此，教师支持也成了公益组织参与流动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教师支持的形式主要包括教师培训、创办教师刊物等。

（1）教师培训

公益组织主要为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提供一些提高课堂教学技巧、班级管理能力和个人发展的课程，也有些项目针对其开展课程的需要对教师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例如RTP等。相比于政府部门，公益组织提供的教师培训内容更加多元，形式也相对灵活多样，部分满足了教师的培训需求。但由于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工作、生活负担较重，参与率较低，加上有些公益组织的培训质量不高、重复内容较多，一些培训效果不佳。随着政府部门开始介入，公益组织开展的教师培训项目作用逐渐降低。

（2）教师刊物

在教师培训之外，如何让教师群体自己发出声音、实现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公益组织致力解决的问题。打工子弟教师之家的成立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通过创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自己的刊物，为教师提供一个发声的平台，提升教师的维权意识和能力。目前主要的打工子弟教师刊物有：打工子弟教师报纸《烛光通讯》（教师之家与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合办）、教师杂志《都市烛光》（教师之家与香港理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合作）等。

4.社区公益项目

流动儿童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居住地主要集中在城市的郊区、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等，一般情况下较少与当地城市儿童混合居住。因此，社区也是为流动儿童提供支持的一个有效的角度。在社区开展的公益项目具有综合性、网络性、方便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1）综合性

与在学校开展的公益项目具有明确的分工并对流动儿童按年龄段进行分组不同，在社区层面开展的公益项目在空间、年龄，以及服务内容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例如图书室、课后辅导、兴趣小组等往往可以在同一个空间中进行，学生在做完作业之后便可以阅览图书、参与兴趣小组，有些社区项目还提供电视、电影等辅助活动设备；不同年龄的儿童在一起玩耍、高年级学生帮助低年级学生辅导功课等，也可以打破年龄隔阂带来的疏离，能够更好地锻炼年龄较大儿童与人相处的能力；由于社区本身的综合性，流动儿童社区公益项目也常常利用这一特点进行一站式服务，例如开展生活教育、组织亲子活动等。

（2）网络性

虽然目前有很多研究者及公益项目人倾向于将流动儿童聚居地区描述为被城市隔离的社区、被边缘化的社区，但是，流动儿童社区内部并不是相互隔离的个体，而是本身存在着网络建构的潜力。流动儿童社区公益项目的网络性主要体现在亲子关系、流动儿童的社区融入以及城市融入方面，例如通过活动设计让流动儿童了解当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空间，了解社区医院等设施，充分利用城市公共资源的外溢性为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提供支持。

（3）方便性

社区资源的综合性以及外溢性为公益项目方便地在社区就地取材奠定了基础。社区居委会、社区的房舍、健身设施、场地，以及一些可以回收的资源都可以成为供经费不足的草根NGO廉价使用的资源。例如四环游戏小组活动中家长将一些废旧物品改装成玩具，不仅节省了市场化供应的成本，也充分利用了社区的闲置资源。

（4）灵活性

相比于学校严格的教学时间和教学纪律，社区为公益组织提供了更大的运作空间和更高的灵活性。不仅时间、场地、形式与参与人员都可以由公益组织自行决定，活动的内容也可以灵活多样——电影、戏剧、出游等都可以在社区层面开展。

公益组织在流动儿童社区开展的项目主要包括课后及课外活动、对家长的支持，以及学前教育三种形式。

（1）课后辅导以及课外活动

公益组织主要通过提供场地和招募大学生志愿者进行课后辅导的形式为流动儿童营造一个课后学习的空间，同时以此弥补家庭课后辅导的缺失。

公益组织在社区层面开展的流动儿童教育支持活动主要有：辅导培训类活动，包括课业辅导、社区图书馆、卫生法律等方面的培训；文娱交流类活动，包括提供休闲、交流场所，举办文娱活动，如智力竞赛、兴趣小组、趣味活动等；社区图书室的创建，包括图书募捐和图书室的建设；援助活动，包括卫生用品和必要的健康器材的发放，例如非典时期发放口罩、温度计、消毒液等。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公益组织社区实践项目有：田村流动儿童社区中心、打工子弟学校爱心会黑桥社区中心、滋根的沙河中心、十分关爱冷泉青少年希望社区、广州康乐社区的小雁子、云南昆明福德社区携手项目等。

流动儿童城市融入方面的公益支持主要包括流动儿童的能力提升活动，例如通过社工小组活动提升社会交往能力，通过家庭、亲子教育提升流动儿童的生活能力，通过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提升流动儿童的职业能力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主动融入城市的活动，例如参观城市著名景点、了解城市的历史、熟悉城市的交通、培养并提升城市生活技能等。例如2011年世界宣明会和启创社会工作发展协会、优势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合作开展“小雁子”、“小海星”服务活动，帮助流动儿童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2）家长的社区支持

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与城市儿童相比比较薄弱，流动儿童父母的教育方式以及家庭教育观念也不同于城市儿童，很多公益项目旨在提升流动儿童家长的素质，从而改善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状况。这一类活动主要包括对家长社会能力的培养和亲子能力的提升。

以“流动人口教育与行动研究中心”为例，他们在田村社区学习中心通过板报宣传和访谈等方式为流动儿童家长提供就业、维权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信息支持，另外，中心还定期开展讲座，内容涉及饮食营养与卫生保健、子女教育、安全、法律等。通过组织家长们进行讨论，分享别人的经验知识，促进彼此的交流，形成互助网络，增强家长的信心，提高他们在公共场合表达的能力。通过培训、讲座、交流等活动，流动儿童家长不仅掌握了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还学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了自己的能力，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互助网络，弥补了他们在城市社会关系不足的弱势，对他们在城市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这些活动也提升了他们进行家庭教育、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能力，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也是一种有效的支持。

针对一些流动儿童家长工作时间长或是家务负担重而无暇参加社区活动的情况，一些公益组织还以报纸、刊物、小册子等形式将一些必要的教育技能以及亲子关系的指导等知识记录下来并发给家长，从而照顾到大多数的流动儿童家庭。

（3）学前教育

社会组织参与流动儿童学前教育主要有成立游戏小组、建设儿童早期发展中心、提供课程或幼儿教师培训以及提供研究平台等形式。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公益组织主

要有：四环游戏小组、救助儿童会早教中心、新苗幼儿园（乐施会）等。部分公益组织也通过开发幼儿课程和提供幼儿教师培训等方式为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提供支持。例如四环游戏小组的家长委员会、妈妈教师培训等。还有很多学前教育研究机构也开始关注流动儿童社区的学前教育，例如千千树教育、奕阳教育研究院等。

（三）公益组织参与流动儿童教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1.取得的成就

虽然我国在2001年就已提出流动儿童教育“两为主”的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责任，但由于财政体系等制度性原因，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并不包含在流入地的政府财政支出中，因此，流动儿童的教育支出就成了流入地政府的一笔额外支出。公益组织通过政府财政投入以外的方式筹得一定的教育资源，扩大了教育供给，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了国家教育财政投入有限性与公民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

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一支主体力量，社会公益组织能够提供更多优化社会结构的机会，通过促进贫困阶层与困难群体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提升生存能力，帮助底层群体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教育公益组织为流动儿童提供了比政府更丰富的资源选择，同时降低了资源获得的门槛，有助于流动儿童获得融入城市生活的必要基础。

相比学校教育的单一授课模式，公益项目的课外活动、艺术教育、课后辅导、阅读项目以及冬夏令营等活动往往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践行一些新的教育理念，强调寓教于乐等，是对强调秩序的正规教育的有力补充。同时，通过强调儿童的参与，在开发流动儿童的主体性方面也具有常规课堂教育所没有的优势。此外，志愿者和流动儿童之间的多重关系也超越了单一的师生关系的模式，体现了教育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2.存在的问题

（1）资源配置不均

公益组织相对于刚性体制的优点在于资源配置具有灵活性，但是，灵活性的另一面则是资源配置的混乱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在缺乏整体规划和全面调研的情况下，公益组织“一窝蜂”地涌进流动儿童社区和打工子弟学校，导致很多项目内容重复、缺乏深度，一些稍有名气的打工子弟学校可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甚至物资捐助重复、冗余，而一些真正需要社会支持的打工子弟学校由于网络、传播等原因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2）缺乏对流动儿童主体的尊重

一些公益组织在开展项目的过程中过于注重自己的目标，而忽视了对流动儿童主体性的尊重。一些资源的提供者站在“施舍者”的道德高地，在项目初期不做需求评

估和服务目标群体的需求调研，而是根据自己对流动儿童群体以及对项目目标群体模糊的、大而化之的了解进行项目设计；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要求服务接受方以仪式化的方式予以配合，从而达到宣传的目的；在项目后期评估中忽视流动儿童从项目中的真正获益，只关注项目自身的收益和项目以及组织的成长。另一些公益项目虽然关注了流动儿童的需求，但由于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真正为流动儿童提供合格的服务。例如志愿者对课堂的掌控能力较差，缺乏系统化的课程设计，课程随意性较大，使课堂教学效果得不到保障。

（3）资金导向

在目前NGO组织尚未形成自身造血模式的情况下，资金来源问题关系到NGO的生存，教育类公益组织也不例外。但所有工作以及项目职能的设计都围绕筹资、募款进行，也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例如项目的运作以筹资为导向而不是以需求为导向，这就使得项目的运作更多地站在捐款人的立场而不是流动儿童的立场上，运作过程也更多以筹资为导向而不是以真正满足流动儿童的需求为导向。在筹款的压力下，很多公益组织的运作也掺杂了市场化的运作逻辑，追求舆论价值和社会声势而忽视被服务群体的真正需要，导致一些本应为长期的教育项目变成了急功近利的宣传项目。

（4）资源利用粗放

公益项目中的资源主要包括两类：志愿者资源与物质资源。打工子弟学校及流动儿童社区通常并不缺少志愿者，而是缺少具备一定能力的专业志愿者。很多公益组织没有为志愿者提供系统的、有质量的培训，一些教育项目缺少培训经费，也没有优质的培训师资；一些项目虽然有培训，但是对志愿者缺乏相应的管理和监督，对课堂缺乏基本的控制和监管，因此项目效果并不明显。

在物质资源方面，公益组织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社区已有的硬件。以四环游戏小组为例，当地社区居民通过废物利用自己动手制作玩具，不仅回收了可再次利用的资源，也节省了购买玩具的成本。但目前一些公益组织过于偏好海外关系、优质资源等，不仅提高了项目成本，项目本身的效果也很有限。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导致很多公益项目可持续性不足。例如一些项目设计为以学期为单位，一个学期之后不再持续；过分追求优质资源忽视已有资源的再开发而导致资源枯竭，或成本过高资金不足，使得项目无以为继。

六、儿童早期教育与成长

（一）公益参与儿童早期教育活动的背景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社会对幼儿教育逐渐重视，学前教育在中国开始普及。城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幼儿园，0~3岁亲子教育在城市中被很多家庭重视。较发达农村乡镇也逐渐出现民办幼儿园。2000年之后，中国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流动，整个社会的学前教育意识逐渐高涨，在2010年前后爆发出学前教育的危急——城市和农村中的很多幼儿不能进入幼儿园。2010年10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根据意见，政府启动了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由此，中国学前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NGO公益组织在2000年之后，就开始关注、支持农村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北京四环游戏小组创建于2004年，为志愿者支持和农民工家长自助的方式解决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问题。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于2005年开始在甘肃省办起了第一所公益性的农村幼儿园，互满爱人与人中国于2008年在云南偏远山区创办村级幼儿班。十年来，陆续有公益组织创办和支持农村幼儿园和流动儿童学前教育机构，探索中国农村儿童和流动儿童学前教育之路。

2011年政府启动“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在农村建设乡镇中心幼儿园，在城市广泛建立民办幼儿园，城市和农村学前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入园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大部分农村和城镇基层幼儿园“小学化”倾向严重，缺乏合适的课程和教学活动；教师队伍不稳定，素质和教学水平也亟待提高；幼儿教育的商业化也使得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同时，政府缺乏对民办普惠式幼儿园教育的支持等等。快速发展的中国幼儿教育，也涌现出很多问题和挑战。中国NGO教育公益组织积极地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寻求解决中国幼儿教育的社会公共服务之路。

（二）典型儿童早期教育案例

1. 办学模式

中国幼儿教育已经有百年历史。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才出现了民办幼儿园。不同于政府、国家事业单位、国营企业提供的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属于个人或民营企业创办的幼儿园，是基于盈利基础上提供幼儿教育服务。是否有其他学前教育模式？“互满爱人与人中国”，“北京四环游戏小组”对社区自治、自助和互助性学前教育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1）“互满爱人与人中国”

2008年至2013年期间，教育公益组织在云南、四川省的四个偏远山区、县实施贫困山区村级学前教育公益项目——“互满爱未来希望幼儿班”。截止2013年6月，云南省镇康县有“未来希望幼儿班”18个，教师18名，服务儿童534名。云南省元阳县

有4个，教师4名，服务儿童102名。云南省香格里拉县有10个，教师10名，服务儿童260名。四川省大凉山布拖县有5个，老师10名，服务儿童276名。

幼儿班建立在偏远贫穷地区的自然村里。利用原有的废弃教学点或另外寻找其他的现成房屋来作为教室。通过项目动员当地社区，每个村庄设立幼儿班家长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积极参与到幼儿班的建设和运行之中。家长委员会和村长一起选出1名年轻人来担任幼儿班老师的工作。负责与教师、项目进行沟通。家长委员会支持项目的创意，参与决定幼儿班的开放时间。从家长那里筹集小笔资金以支付幼儿班老师的津贴和一些特殊活动的开销。同时家长接受关于儿童护理、营养和儿童早期发展知识的培训。他们与互满爱人与人的项目员工合作共同负责管理幼儿班。

家长委员帮助组织家长进行培训关于儿童早期教育，儿童心理学，卫生知识，营养和健康知识。通过组织家长互相交流相关营养项目，如：如何养鸡生蛋，如何种植大豆和葵花籽的技术，使他们支持营养项目的开展，家长将这些收成交给幼儿班老师，来让他/她每天早上为孩子们准备一个健康的早餐——每个孩子每天早上一个鸡蛋，一杯豆奶，一把富含奥米伽3油的葵花籽，一种对大脑发育很有价值的脂肪酸。

互满爱“未来希望幼儿班”为建设村级幼儿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010年国十条颁发后，各级政府开始重视农村幼儿园教育，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乡镇中心幼儿园。村级学前教育如何办？“互满爱未来希望幼儿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互满爱社区自治、自助和互助式村级幼儿班给政府和公益组织在贫困山区村级幼儿教育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2）“北京四环游戏小组”

该项目成立于200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流动儿童问题研究中心创办，为北京四环市场流动儿童提供学前教育。四环游戏小组采用大学生志愿者为主导，家长是教育的合作者和支持者，由此实现家长之间育儿互助。家长们积极参加组组织的各种活动，并担当起“妈妈/爸爸老师”的角色。家长创建“自助基金”，尝试作为组织的教育者并承担管理责任。每天由志愿者和“妈妈/爸爸老师”照料孩子，带领做孩子游戏、阅读、手工等教学活动。10年来，已有数百名四环市场的幼儿从“四环游戏小组”毕业。

（3）阳光童趣园

2000年之后，中国教育公益组织积极探索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模式。其中包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阳光童趣园，广西田东晨曦农村幼儿园、爱达讯“东马村&宝贝计划”等。香港活知识教育机构赞助的四川大邑县上安镇幼儿园从2012年开始探索农村公建民营幼儿园的办园模式。“互满爱人与人中国”从2008年开始探索贫困山区村级幼儿班模式。

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是国内最早做农村幼儿园教育探索和支持的机构。2005年在甘肃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支持建立第一个农村幼儿园，到2013年在甘肃陇南地区

建立40余所农村幼儿园，并支持陇南地区多个农村学前班。在建设幼儿园同时，为童趣园做教师培训及管理培训。引入适合西部农村儿童与教师需要的教学资源，为童趣园整合一套合适课程和教学活动。在收费很低的情况下，保证童趣园有高质量的教学。阳光童趣园非常注重农村幼儿的保育与健康。每所项目园都为幼儿提供体检、免疫与健康档案的建立，并为负责当地幼儿健康的相关人员提供儿童保育与免疫等专业培训。阳光童趣在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都强调“留守儿童关爱”，并把家庭教育作为幼儿园教育的重要部分。每个项目园均开设家长学校、亲子游戏、社区互动等活动，把幼儿园、家庭、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

西部阳光在陇南等地建设童趣园。对容纳80~100名幼儿的幼儿园投资不到10万元，建成后交由当地教育部门管理。和教育部门合作，扶持幼儿园达到自负盈亏，以最小的投入达到最大化受益；给山区幼儿园核算出一个基本建园成本和运营成本；给山区大规模建幼儿园提供建园和运营的模式。编写《阳光童趣园项目操作手册》，向社会介绍如何在农村地区办幼儿园。

阳光童趣园项目系统地探索了贫困山区农村幼儿园办园的模式。包括办园经济成本、幼儿园管理，教师培训，课程服务，社区教育等。

中国当代教育处于政府完全管制之下。在教育多元化时代，城市社区、农村贫困山区如何采用社区自治的方式开展学前教育？社会和社区自治、自助和互助性教育是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互满爱人与人中国”、“北京四环游戏小组”和“阳光童趣园”做出了积极地探索。

2. 课程建设

大部分农村幼儿园和城镇基层幼儿园师资差、教学资源少，班容量大，教师少，教师工作量大。很多家长缺乏正确的幼儿教育观念，认为上幼儿园就是上学，上学就是识字、写字、算算术。为了迎合家长，农村和城镇基层幼儿园普遍存在严重的小学化。大部分幼儿园使用所谓“五大领域”的教材。每个孩子每学期有5本很薄的课本，课本中有简单的配图小故事和儿歌。每周大约上每本书的一页内容。这类教材表面上似乎符合《纲要》的要求，是在进行“五大领域”教学，实际远不能达到《纲要》和《指南》的教学目标。

城市教育系统公办幼儿园中推行的主题、整合式课程，建构式等教学活动，对老师素质和教学经验要求很高，对教学资源和教学成本要求也很高。这类课程不适合目前大部分农村和城镇基层幼儿园。

北京千千树是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支持下建立的社会企业，从2011年开始，为农村幼儿园和城镇基层幼儿园研发“经济、实用、有效”的公益性课程和教学活动。包括“听阅读”、“绘本阅读”、“动画片阅读”、“动作儿歌”、“音乐活动”、“数学”、“学前班识字”、“游戏”等系列课程。千千树课程以阅读为主体，选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影视作品、经典儿歌童谣，根据幼儿认知、语言发展规律进

行分级，把五大领域整合进阅读活动中。在农村和城镇基层幼儿园推广“早期阅读”活动，促进农村幼儿认知发展，提高幼儿语言和阅读理解能力，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中低收入人群幼儿进行文化和思想的启蒙。从2012年启动“千千树农村幼儿园发展公益项目”起，千千树课程及活动已经在北京、甘肃、湖北、四川等省市50多所农村幼儿园，近万名幼儿中广泛使用。千千树课程以贯彻《指南》为目标，根据目前农村和城镇基层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初步探索此类幼儿园课程和教学活动改革。

3. 教师队伍建设

农村幼儿园和城镇基层幼儿园缺乏合格的专业教师，乡镇中心幼儿园大部分是转岗教师，需要进行系统培训，并建设农村幼儿园骨干教师队伍。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北京四环游戏小组、北京千千树、香港活知识教育机构，香港苗圃行动等公益组织近年都积极探索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以下介绍“千千树农村幼儿园发展项目”中农村幼儿园系统培训和骨干教师建设计划，北京四环游戏小组“种子计划”。

(1) 千千树师资培训项目

千千树于2011年开始在北京、河北、山西、青海、湖北、甘肃、四川等省市进行农村幼儿园教师和流动子弟幼儿园教师培训。根据国家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乡镇中心幼儿园在这两年逐步建成并投入使用。千千树与湖北、甘肃、四川等省地方教育局合作，探索农村乡镇中心幼儿园教师系统培训和骨干教师队伍建设的方法。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千千树研发一套适合农村乡镇中心幼儿园教师的系统培训课程。用这套培训课程在两年时间中对老师进行培训，并通过结合老师教学实践，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和素养。

第二，千千树研发一套针对教研员和培训教师培养的课程。

第三，千千树为试点县教育局培训专职教研员和培训师。在2年中经过多次培训，为县教育局建设一支教研员和培训师队伍。

第四，千千树在两年中每年为试点县乡镇中心幼儿园老师进行集中培训一次，县教育局培训老师逐步承担起集中培训任务。

第五，县教育局专职教研员在十所试点乡镇中心幼儿园巡回指导教学。挑选和重点培训骨干教师。通过教研活动培训教师和培养骨干教师。

第六，项目实施的两年中，每年对骨干教师进行3~4次短期集中培训。针对教研员在巡回教研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培训和研讨，开始由千千树和县教研员、培训师共同承担，后逐渐由县教研员和培训师完全承担。

项目计划实施两年时间，千千树积极探索农村乡镇中心幼儿园教师系统培训模式，帮助县一级农村幼儿园教育自身持续发展。

(2) 四环游戏小组“种子计划”

2012年3月-2013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流动儿童问题研究中心受北京市教委委

托，对北京市城乡结合部以流动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十余所民间应需而生的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和园长，开展了为期一年2个月的师资培训，即“种子计划”，共进行了20余次集中培训，传播四环游戏小组的教育理念和符合需要的教育方法。为期一年多的种子计划培训也为在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大量现有体制外的民办园给予引导扶持，为推动其教育质量的改进提供了成功的样本。

4. 社区教育

说起学前教育，人们自然想到孩子上幼儿园。孩子是否可以不上幼儿园，也能得到合适的学前教育？“北京四环游戏小组”和“互满爱未来希望幼儿班”对非正规化学前教育进行了探索。

（1）四环游戏小组

2004年，北师大学前教育系张燕教授看到北京四环市场内陪伴父母工作的幼儿，不能接受幼儿园教育。北师大学前教育系的师生们在四环市场一间仓库里办起了四环游戏小组。学前教育系的师生作为志愿者，每天坚持为四环市场的幼儿讲故事，做游戏。家长也积极参与到游戏小组中。把正规化幼儿园教育的内容，以非正规化的形式使流动儿童获得学前教育。不仅以“低成本、高效益”方式解决流动儿童学前教育，也开始进行多元幼儿教育形式的探索。

历经10的教育实践证明，这种非正规化、社区的教育形式，也能让儿童得到较好的教育，促进幼儿各方面的发展。

（2）“互满爱未来希望幼儿班”

把社区教育、自然教育和非正规化教育融合在一起，让幼儿班的孩子去拜访当地的‘资源性人物’——让孩子们去主动了解生活和工作，如拜访老人，请老人讲自己童年，拜访修自行车的人，拜访司机，请他们说说他的工作，如何保养车，如何避免交通事故等；给孩子们讲解怎样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牛，怎样种地；让孩子们每月一次为社区工作做点贡献——可以是帮助一对老夫妇打扫他们的屋内屋外环境卫生，可是帮助村子清理垃圾，种花美化环境，种草药给需要的人或卖掉。；在每月的文化表演晚会上演一个节目；积极让孩子贴近自然。学生和老师一起探索书本以外的知识：自然，动物，运动技巧，植物的收集，植物的种植，疾病的防治和卫生知识。

中国教育缺失社区教育，这种社区教育、自然教育和非正规化教育结合的形式可以在农村的村庄，城镇和城市的各类社区中进行推广。

（3）童心园项目

当大部分公益组织在进行农村幼儿园和流动子弟幼儿园教学探索时，成都爱达讯开始进行城市弱势群体幼儿社区和家庭教育探索。

童心园项目是成都爱达讯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成都市最大的经适房、廉租房区社区和家庭幼儿教育项目。项目自2012年8月启动。通过开放1间学龄前儿童友好活动中

心，向社区儿童提供安全的公共活动空间。依托活动中心，招募学前教育、社会工作专业志愿者开展儿童成长小组活动、家长沙龙、家长讲座、社区宣传等项目活动。服务0-6岁儿童约为120名。其中70名在周围上民办幼儿园的3-6岁儿童。

开展4期共16次学龄前儿童小组活动。小组活动以学龄前儿童社会性成长为主要目的，根据儿童成长和发展的要求，分别设置“好习惯”、“懂礼貌”、“好品格”及“自我保护”四个主题。小组活动以绘本故事、情境模拟、角色扮演、区角游戏等方式开展。

项目开展30余期家长沙龙活动。家长沙龙活动以向家长传授育儿知识、提升家长学前教育意识、培养亲子关系为主要目的，开展方式主要有亲子游戏、亲子手工、区角游戏等。

童心园项目在城市弱势群体社区“儿童活动中心”准专业社会志愿者招募、培训，提高“儿童活动中心”水平方面都做出了积极探索。

5.互联网幼儿教育

利用互联网技术，采用“低成本、广覆盖、高质量”的方式为全社会提供幼儿教育公益服务。北京千千树在互联网幼儿教育公益服务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千千树整合优质幼儿教育资源和社会力量支持。建立“千千树网站”（<http://www.qianqianshu.org/>）。为全国农村和城镇基层幼儿园教师提供公益服务。这些教育资源也同时为家庭和社区幼儿教育提供公益服务。

千千树网站目前已经有200多个优秀分级儿童文学故事视频和音频，为老师和家长做教学示范。每个故事配有对教师的教学指导。160多个动作儿歌，80多个音乐活动，供幼儿园、社区和家庭开展阅读、游戏、音乐活动。

（三）教育公益组织早期教育项目的发展趋势及方向

整体来看，目前学前教育类公益组织主要呈现出如下的发展趋势：

第一，与地方政府合作，研究探索乡镇、农村幼儿园的运营模式。三年行动计划，中央政府重点支持中西部建设乡镇中心幼儿园。各地政府也把乡镇中心幼儿园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重点，大办公立乡镇中心幼儿园。在短期内能够解决部分农村孩子入园。但幼儿园运营和维护成本很高。一个班至少需要2名教师。建园和维护成本远高于小学。中央和省财政一次投入硬件建设，而后续的运营和维护需要县一级地方财政负担。中西部大部分县都存在财政负担过重。现在已有很多投入使用的乡镇中心幼儿园存在运营困难。公益机构和地方政府合作，研究和探索各地乡镇中心幼儿园的运营模式，家庭支付能力和政府负担之间的关系，公办幼儿园降低运营和管理成本，寻求合理、适用的管理模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对保留乡镇民办幼儿园的地区，研究如何让乡镇民办园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如何得到政府的扶持，如何提高保育和教学水平，提高竞争能力。让政府认识到不要垄断乡镇幼儿园教育，否则地方政府不仅要投入更高的支出，也会让教育失去活力。

同时，村一级幼儿教育急需研究和探讨。需要研究村一级幼儿教育的社区自治、自助、互助模式，研究政府对村一级幼儿教育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扶持的方式。互满爱在云南的村级幼儿班公益项目，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公益机构不仅要把村级幼儿教育当作慈善和公益项目来做，更要把它做一个公益性的研究项目做。在不同的地区，寻找合适的模式。去推动政府和社会普及农村村一级学前教育。

第二，探索城市民办教育的发展方向，帮助城市民办教育机构走出困境，摆脱恶性竞争。数据显示，城市民办园大约容纳70%以上在园幼儿，是城市学前教育的主力。城市中的公办幼儿园，在各地有很大差异。大城市及东部发达地区的公办园比较高，广大中西部地区的3、4线城市、县城中公办园占的比率很低。很多县城的公立园仅有1~2所。

国十条之后，政府鼓励多种形式办园，民办幼儿园在城市中迅速发展起来。但很多地方并没有相应的政策扶持。民办园在城市中处于两级分化中，少数民办园走向高收费。绝大部分民办园师资差，教师流动很快，教师待遇很低，教师工作繁重、班容量大、教学水平低，小学化倾向严重。大部分民办园迎合家长小学化教学要求和低收费要求，进行恶性竞争。政府的监督和管理目前也主要是园舍等硬件建设和安全检查。而课程建设、教学和保育质量、师资培训、教师待遇、幼儿园管理等很少有配套的政策和实际需要的支持。快速发展的幼儿民办教育也正在快速走入困境。

政府在今后几年中会不会像办乡镇中心幼儿园一样，投入巨资在城市中办公立园？答案是对绝大部分地方政府绝无可能。因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学生进入城市，小学和初中严重不足，大部分地方政府在若干年内都会为此伤透脑筋。如何帮助城市中民办幼儿园走出困境？如何摆脱恶性竞争？公益机构也应进入这个领域进行探索和支持。

第三，积极探索农村和城镇幼儿园课程建设和教学活动。一、不同类型和形式的农村、城镇基层幼儿园教育，都应以教育部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为基准。应对课程和教学活动进行分层和分级设计，让条件较差的农村幼儿园也能部分达到《指南》的要求。

二、农村和城镇基层幼儿园急需一套低成本、实用、有较好效果，对老师素质和教学经验要求不高的课程和教学活动。公益机构可积极研发课程操作性强，老师容易学习和教学。班容量较大也方便使用的教材和活动。三、公益机构可以整合资源，开发当地的乡土课程，比如乡土的民间故事，方言儿歌和童谣，传统礼仪，当地的音乐、舞蹈，结合当地自然、农业、环境等开发科学教学活动等。

第四，参与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培训。农村和城镇基层幼儿园教师培训应根据教师现有的素质和教学经验，结合幼儿园能够开展的课程和教学活动进行培训。需要研究出一套系统的培训课程和阶梯式培训方式，在2~3年内持续进行培训和便于老师自身学习。在培训中提高老师教学技能，在逐渐提高教学技能中深化培训。研究建立县一级的幼儿教师培训队伍，降低培训成本，提高培训效果。应该对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一视同仁，因为民办幼儿园教师素质普遍较差，民办园在城镇中又担负着主要的幼儿园教育任务。国家的培训更应该向民办园和乡镇幼儿园倾斜。

实事求是的进行农村和基层幼儿园教师培训，帮助建立县一级幼儿园教师队伍，研发系统的农村和基层幼儿园培训课程，探索培训方式。探索基层民办幼儿园老师的培训方式，探索村一级幼儿班老师的培训课程和培训方式，是一件任重道远的工作。公益机构也能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互联网为农村幼儿园和城镇基层幼儿园教师提供公益性培训，是成本很低，覆盖很广，效益很高的培训方式。公益机构也应积极参与和推动互联网幼儿教师培训。

第五，积极探索多元化幼儿园模式。中国农村和城镇普惠式幼儿园，应该是一种办园成本低、效率较高、效果较好的办园模式。应该保证幼儿园教师的收入不低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政府和家庭的幼儿园教育支出都应该在合理可以负担的范围之内。在保证一定教学效果前提下，尽量减少办园成本，减少政府和家庭支出。政府目前审定的办园标准要求较高，高成本的模式很难推行普惠式幼儿园。应支持和鼓励教育多元化的探索，鼓励办社区自治、自助、互助性幼儿园。公益组织可以在农村村一级社区，和城镇中低收入人群中探索社区性自治、自助、互助性幼儿园办园模式。

第六，积极探索社区和家庭幼儿教育。中国中低收入人群文化程度较低，这些家庭父母缺乏教育幼儿教育意识、能力和时间不足。尤其是很多农村留守儿童，以父母为主的家庭教育严重缺位。城市中等以上收入家庭，文化程度较高。也比较重视家庭幼儿教育。但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方法，被商业机构宣传左右，对幼儿教育产生焦虑，给家长和孩子带来沉重经济和精神上的负担。针对幼儿社区和家庭教育现状，公益机构可以在以下方面努力：

一、宣传和普及科学的幼儿教育观念。包括通过互联网站进行宣传，拍摄纪录片和电视片宣传。组织志愿者培训，进入社区进行宣传。

二、提供公共服务资源。通过互联网等多种媒体，为家庭提供适合家庭和社区的幼儿教育活动。

三、在城镇社区，组织以社区幼儿父母为主的志愿者，进行简单培训，提供社区和家庭幼儿教育活动内容和方法。由少数父母带动社区幼儿教育。如组织社区幼儿阅读、游戏活动。组织社区内父母交流幼儿教育心得，在幼儿教育、保健、养育方面互相帮助。

四、在城镇中低收入人群社区，农民工居住社区，办儿童活动中心。以志愿服务的方式组织幼儿开展阅读、游戏、音乐等活动。通过儿童活动中心提高父母的教育意识和教育能力。成都爱达讯在城市低收入社区幼儿教育做了积极的尝试。

五、农村社区和家庭幼儿教育，通过农村乡镇幼儿园、村一级幼儿班。组织父母参与幼儿园教学，办父母幼儿教育讲座。向父母传递科学的教育观念和方法。宣传幼儿保健、疾病预防、营养等知识。把幼儿园教育向家庭教育渗透，提高农村幼儿家庭教育和幼儿保健水平。公益组织寻找教育和幼儿保健方面的专家，编写简单、可操作、实用、系统的家长课程、宣传手册，在乡镇幼儿园和村一级幼儿班中进行家庭教育宣传使用。

七、阅读推广

（一）社会背景及发展现状

民间组织参与乡村图书馆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海外华人举办的民间组织和国内的民间公益机构在针对中国贫困地区教育援助的过程中，很快注意到乡村学校图书匮乏的问题，于是开始把捐赠图书、捐建图书室作为项目纳入到整个公益活动中，例如美国科技教育协会、青树基金会、陈一心家族基金会等。但总的来说，2008年以前，民间公益组织对中国教育的参与，更多还是在希望小学捐建、贫困学生助学、残障儿童救助等领域，对阅读的关注不够，早期的一些图书捐建和图书馆建设，数量不多，规模不大，效果也不是非常理想。2008年以后，因为公益意识和环境的改善，儿童阅读氛围的形成，民间阅读公益组织发展迅速。近四五年来，民间阅读公益机构呈现出以下发展现状。

1. 民间公益阅读机构数量迅速增加。

有人将2008年称为中国的慈善元年。“5.12”汶川大地震全面激发了国民的公益意识，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企业公益意识的全面觉醒，为民间公益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最近三四年以来比较活跃的一些民间公益阅读组织大多诞生在此之后，或者从那时之后逐渐将主要方向定位在阅读。据致力于成为民间阅读公益事业平台的心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伍松粗略估计，这四五年以来，重点从事儿童阅读推广的公益机构，并且一直在坚持做的，大约有200多家。其中比较活跃的大约有60~80家。主要针对学校推广的机构有真爱梦想基金会、天下溪公益图书平台、立人乡村图书馆等37家，主要致力于社区推广的有希望社工服务中心、同心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在亲子阅读公益领域，公益小书房、深圳三叶草等是其中比较突出的组织。主要借助于网络平台实现的公益机构有一公斤捐书网、扬帆计划、彩蝶计划等。这些机构从其性质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资助为主的公益组织，主要致力于推动其他公益机构开展阅读项目，例如心平公益基金会、陈一心家族基金会、西部阳光基金会等。第二种是既有筹款功能，又直接开展阅读项目的运作性公益机构，例如真爱梦想、担当者行动、海外中国教育基金等。三是以策划和执行阅读项目为主的公益机构，例如天下溪等。这些民间公益的项目点分布广泛，几乎覆盖全国版图。但更多更集中在西部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乡村和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儿童。尤其集中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宁夏等地区。由于创始人、理事背景、定位、宗旨和各方面的原因，各民间公益组织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服务个性。

2. 儿童阅读成为近年民间公益阅读的主要阵地。

2008年以来，民间公益组织不约而同选择儿童阅读（主要在3-12岁阶段，有些覆盖到初高中阶段）作为资助和策划项目的重点。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本世纪以来儿童阅读推广事业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公益发展和儿童阅读的自然融合。

2007年以后，各地以儿童阅读推广为主题的论坛和聚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集度。近三四年来比较活跃的从事阅读推广的机构，几乎都是将3-12岁，尤其是6-12岁，也就是小学阶段儿童的阅读作为项目策划和开展的重点，因为公益机构的朋友们越来越认识到儿童阶段是培养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的关键时期，同时幼儿园、小学生的升学压力要远远小于初高中，阅读推广因而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从捐赠图书到促进阅读、教育革新和社会重建。

彩蝶计划的执行人曾经将儿童公益的链条概括为：让孩子们“吃上饭--穿上衣--有人爱--远疾患--去上学--有书读--上好学--读好书”。2008年以前的民间公益组织，大多在关注“吃上饭--穿上衣--有人爱--远疾患--去上学”这些基础性的环节，阅读项目没有规模，捐赠的童书缺乏质量，也缺乏相应的阅读支持。2008年以后，更多的公益机构纷纷将目光凝聚在儿童阅读上，并把项目重点放在大量捐建图书馆、图书室、图书角上。其中比较突出的有真爱梦想、滋根基金会、担当者行动、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微笑图书室、一公斤捐书网等。但他们已和以往一般意义上的捐书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是这些民间公益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在和儿童阅读机构交流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儿童阅读的理念，其次是由于有了相对比较成熟的阅读书目，捐赠的图书相比以前有了较好的改善。随着儿童阅读公益项目的深入，如何更好地帮助各图书阅读项目点运营，更大地发挥图书的作用的，如何培养更专业的志愿者和阅读种子教师的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绝大多数公益机构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捐赠图书的同时，建设阅读支持系统来更好地发挥图书的作用，包括让儿童参与图书日常管理、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阅读志愿者和教师的培训等等。

（二）典型案例

2008年以来，民间公益阅读组织中，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机构，由于篇幅限制，择取其中六家作为典型介绍，并试图做一些分析。选择这六家机构的标准主要包括：

（1）推进民间公益阅读的贡献大小；（2）阅读项目投入的规模和资金量；（3）机构的管理和运作水平；（4）阅读项目的策划能力和创造性和个性。

1.心平公益基金会

心平公益基金会是企业家段永平先生及夫人刘昕女士发起，于2008年获民政部批准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其核心项目为从图书到阅读项目和大学生公益项目。从图书到阅读项目倡导各类公益组织在儿童阅读领域积极开展合作，向中国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小学和初中捐赠优质图书，协助这些地区持续推动和改善儿童阅读。心平公益基金会是中国儿童阅读领域最大的资助型基金会，是国内最优秀的阅读推广公益机构。根据心平公益基金会网站公布的数据，自2008年9月到2013年6月，心平基金会共向25

省市的1418所学校及社区捐赠了图书阅读项目。其中包括：3894个图书角（覆盖467所学校），90间社区图书室，861个学校图书室及其他图书阅读项目。

心平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不断优化儿童阅读生态循环圈，努力与合作伙伴共同打造“无边界”的学习共同体与协作创新平台，让公益阅读机构享有更多地运作分享、经验交流和业务合作的机会，其中“乡村图书馆建设和乡村阅读论坛、公益图书中盘”就是其中突出的成绩。乡村图书馆建设和乡村阅读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三届，为推动公益阅读机构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们还发起举办分地区的心平伙伴圆桌会议，并举办了武汉（2010）、成都（2011）、成都、培训（2012）等圆桌会议。

心平基金会还积极促进部分心平公益伙伴及民间教育机构合作，积极资助民间公益机构和项目点的优秀教师参与由民间教育机构举办的阅读推广研讨会、教师研习营等活动。截止到2013年6月，心平基金会与部分心平公益伙伴及民间教育机构合作，参与资助了阅读推广研讨会、教师研习营、公益图书中盘等不同类型的阅读支持项目22个，共捐款138.8312万元人民币。

2.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于2008年经上海市民政局批准成立，其前身是于2007年10月在香港注册成立的“真爱·梦想中国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真爱梦想在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体系化的公益产品和服务体系。其核心项目，“梦想中心”（连锁网络体系）、“梦想课程”（课程创新为核心的素质教育体系）、“梦想领路人”（以探究型学习为核心的教师培训体系）、“梦想银行”（以教师发展和教师奖励作为主要推动力的激励体系）互相支撑，以系统化的方法，在传统教育的空间中注入平衡人格、创新精神、多元探究的素质教育，从形式到内涵，试图构建统一的、标准化的公益“麦当劳”。

真爱梦想的核心公益产品——“梦想中心”，是一个设计独特、分布在各个乡村学校中的标准化多媒体教室。基本配置为：图书3000册（其中包括1000册新书和2000册二手书）、彩色可移动桌椅若干、联网电脑若干、55寸液晶电视机或投影仪一台、500G移动硬盘。为了满足更多贫困地区中小学生对课外图书的需求，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联合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心平公益基金会、《经济观察报》在现有“梦想中心”学校网络周边开展了二线产品——“梦想书屋”计划，为学校提供1000册二手图书、一组书架、一台电脑、一套图书馆管理系统、一支扫描枪，更有针对性的开展乡村教育公益项目。“梦想格子”是以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核心公益产品“梦想中心”和二线产品“梦想书屋”为基础的三线公益产品，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班级小图书角。它包括一个彩虹书架和100本二手图书。

“梦想课程”是一系列面向义务教育1—9年级，基于“全人教育”理念，融合问题探究、团队合作、创新创造、环境保护、情绪智能等元素的跨学科综合素质课程。梦想课程包括“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如何去”三个大模块，分别设置了

适合1-3, 4-6, 7-9年级的分阶课程。在梦想课程的设计中, 强调以问题导引的团队探究和以游戏达成的体验学习。为了让老师们学会上“梦想课程”, 真爱梦想设计了一套课程培训体系, 称为“梦想领路人培训”, 包含“梦想教练计划”和梦想领导力培训。

3. 陈一心家族基金会

陈一心家族基金会是中国发起成立较早, 并开风气之先, 专注于儿童阅读的民间公益组织机构之一。2003年成立于香港, 2006年发起成立书伴我行(香港)基金会, 2008年发起成立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 为推动国内原创图画书做出了很大贡献。2011年在合肥举行第三届“阅读的力量”国际论坛, 2012年在合肥成立“石头汤悦读校园联盟”, 2013年在北京组织NGO阅读学习网络, 2013年在香港推行“爱阅读·爱学习”倡导活动。十年来, 在内地和香港, 深耕儿童阅读, 对于推动国内和香港的儿童阅读发展, 带动民间公益机构推动阅读功不可没。陈一心家族基金会每年资助的重点都在儿童阅读领域, 根据2011—2012年报, 这一年度中, 拨款项目中阅读项目占了绝大多数。

石头汤悦读校园联盟项目是陈一心家族基金会近年来重点自主运作的一个公益项目。项目主要在合肥包河区实施。前身是2006年一个多校联动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 由合肥屯溪路小学发起、陈一心基金会资助的为期两年的“好书大家读”活动。项目前期主要侧重于为孩子们提供更多适合的书, 努力打造理想的学校图书馆。2010年项目调整了思路, 侧重于校园阅读环境的打造, 主要针对阅读环境中三方面的因素: 书、时间与入, 通过这些因素的改善来促进全校阅读环境的改善, 从而帮助更多学生养成阅读兴趣与习惯。这一阶段的多校联动活动, 更侧重于各校根据自身的条件独立打造各具特色的校园阅读文化。石头汤联盟到目前为止, 还审批了29个创新基金, 开展了9期的图书馆老师培训, 举办了若干儿童文学、阅读推广方面等专家的讲座和工作坊, 并由Stephen Krashen团队设计合肥阅读项目的评估调研方案。

4. 担当者行动

2004年12月, 出于对自己公民责任的意识和担当, 在大学任教的张同庆老师和他的几位朋友在福建泉州发起成立了担当者行动。2009年3月, 担当者行动在厦门注册了担当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负责担当者行动公益助学项目的活动策划和推广。2013年3月5日, 担当者行动正式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成功, 正式获得了政府承认的非营利组织法人资格。

“班班有个图书角”是担当者行动的核心运作项目。担当者行动也是图书角类公益项目中, 全国运作得最好的一家机构。在比较缺乏课外图书资源的乡村和打工子弟学校的每个班级都建立一个标准化配置的图书角, 不需要专门的场地和专人管理, 孩子们可以在课间和放学后随时取阅。班级图书角因为距离孩子最近、书目配置科学、管理简单规范、使用扩展性高、项目复制性强等特点, 得到了项目点学校师生的欢

迎。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从2009年下半年启动至2013年6月，已经先后在福建、江西等15省份的220所农村中小学及城市打工子弟中小学捐建了2300个图书角，为60000多名贫困地区的孩子送去了92000多册精心挑选的课外图书。

同时担当者行动致力于联合社会各种资源，建立一个全面、专业的课外阅读助学体系——“班班有个图书角”课外阅读助学体系。课外阅读助学体系以班级图书角建设为前期导引，在项目受助学校的每个班级建立标准化配置的图书角以后，通过阅读领航员教师培训、少儿课外阅读活动中心、未来英才夏令营和少儿课外阅读研究中心等四位一体的后期辅助支持体系，为乡村孩子和打工子弟学校孩子提供全方位、多形式的课外阅读资源和课外阅读辅导，助力中国乡村孩子全面成长。

这个项目运作三年来，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专职人员严重不足。志愿者是担当者行动的主体，但担当者行动在志愿者的动员、培训、参与、服务等方面还做得不够，再次是教师作为项目学校阅读推广和辅导的主题，担当者项目学校的种子教师动员、培养、支持等方面做得也还不足。还有，就项目本身而言，单个图书角项目，明显过于单一、单薄，对学校长期的、系统的后续支持力度明显不够。这些方面都需要担当者行动积极反思，努力建立系统化的机制，完善项目设计，并将资金和人力向后期支持系统倾斜，争取获得项目和基金会运作整体上的突破。

5. 新教育基金会

新教育基金会又名江苏昌明教育基金会，是2010年2月在江苏省民政厅注册成立的一家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是倡导新教育文化，促进新教育实验的发展，让更多的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基金会的使命是成为促进新教育实验发展和推动中国教育创新的助推器。新教育基金会的核心项目是完美教室、新教育图书馆和卓越课程。

完美教室试图打造一个个充满活力的班级共同体。他们通过亲子活动节日课程、成长仪式生日诵诗等形式为孩子营造最适宜的班级生长环境。基金会以比较严格的标准择选项目教师，新教育基金会为“完美教室”的老师在班级开展各种活动与庆典提供资金支持。截至2013年4月9日，基金会已实施捐建的完美教室总计23个。新教育基金会向实验点提供新教育课程研发经验并进行指导，研发符合班级情况的课程，由新教育研发专家、新教育名师等开展新教育通识培训、班主任专业培训，新教育课程指导教学、大量阅读写作等。

新教育童书馆旨在为那些学校具有一定的阅读氛围，图书匮乏的新教育学校捐建童书馆。分为小型（村级单独学校式）、中型（乡镇级）、大型（县市级）。新教育童书馆”联合新阅读研究所，集合众多阅读专家，精心挑选并共同打造了一批适合不同年龄孩子阅读的精品书目。同时为了加强区域阅读文化的建设、深度推进新教育阅读理念，围绕童书馆还有一系列软件配套设施。每个班级一年中至少可共读4种童书。校内同年级之间漂流借阅，每个学生一年至少可自主选读童书100本。每个学校

一年中最少可有135种书供教师选择阅读。截至2013年4月，已合计捐建新教育童书馆47所。

卓越课程，是指向新教育专家团队和实验学校中那些具有丰富经验的实验教师提供必要的资金和相关支持，鼓励他们开发支撑和推进新教育实验的课程。迄今为止，已开发，含正在开发的课程有：儿童诗意课程、儿童写作课程、儿童数学课程、儿童电影课程、儿童哲学课程、儿童幸福课程、印象山水课程、传统文化课程和绿拇指儿童阶梯写作课程。

6.立人乡村图书馆

立人乡村图书馆是由李英强发起，并在若干对公民社会建设和公共事务比较关注的一些企业家和学者的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以阅读为技术路径，以立人为教育宗旨的公益组织。立人乡村图书馆力求以图书为载体，以教育为内容，立足乡村，连接城市，推广国民阅读，促进乡村教育革新。立人各图书馆均致力于成为当地的学习中心和教育基地，文化中心和精神家园，交流中心和公共平台。

2007年12月底，第一座立人乡村图书馆，在青石镇中学内试营业，起名“黄侃图书馆”。在各界热心人士和公益组织的大力支持下，迄今已在湖北、河南、四川、云南等地建设十多个分馆，每个分馆已经实现平均馆藏书6000册（含杂志）。立人同时试图通过丰富的阅读活动来拓展乡村图书馆的功能。包括立人读书会、电影欣赏、访问学者、作文比赛、冬令营/夏令营、立人选修课、2.0图书馆等。但初中高中生能否有充分的时间来读这些真正意义上的好书，乡村图书馆的管理者们有没有能力，通过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从应试教育中“争夺”到学业负担极重的学子们来阅读和思考、分享，也是很关键的问题。

立人乡村图书馆是民间公益机构中个性较鲜明的一个。这和创始人的身份和个性、宗教信仰有一定关系，更重要的还是立人的项目策划和设计较鲜明的带有公民启蒙、乡村重建的色彩，并与政府存在一定程度的对抗有较大的关系。含合作馆在内，曾经开放的十三个馆目前已经停止运营的图书馆达到六个。立人图书馆大多开设在乡村中学里，也不仅仅是偶然。尽管也有一些独立的立人馆，立人图书馆里也有一些童书，但你如果认真阅读立人的书目，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图书馆的书目更多的是一些希望让孩子们读了“能睁开眼睛看”的图书，而这些并不适合小学生。立人的项目设计更适合初中以上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同时更适合于定位在培养未来有独立思考力和行动力的精英和担当者。

此外，在众多公益阅读组织中，还有一些机构和项目运作得非常出色，值得关注。例如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爱的书库”项目和“滋根图书角”项目、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的“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北京天下溪图书公益平台、六和公益“老家乡”乡土项目、“扬帆计划”、亲子阅读公益组织（例如公益小书房、快乐小陶子和深圳三叶草等）。

（三）问题及发展趋势

从本世纪初开始的儿童阅读推广，是在国际儿童阅读推广的背景展开的，是对当代中国应试教育的一种拨正，是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童书出版和发行、幼儿园、语文教育界、家长等各种力量努力、综合推动的结果。2008年以来民间公益阅读组织在推进乡村阅读，改善乡村教育环境，重建乡村社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乡村的儿童阅读，全社会的阅读公益工作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1. 阅读公益生态圈需要不断完善和形成良好的循环

有效地促进青少年的阅读，为儿童自主发展和开放教育提供社会化的阅读教育服务体系，是培养世界公民的重要路径。但要有效地促进阅读，就必须建立比较好的阅读生态圈。阅读生态圈是一个较大的循环系统，包括国家阅读公共政策、全民阅读理念、阅读理论建设、阅读课程和书目研发、学校和社区图书馆以及家庭藏书、阅读公益资金筹集、专业的阅读教师和志愿者、懂得阅读而且有一定协助能力的家长等等。通过各种研究、呼吁和实践探索，不断优化阅读生态圈，才能保证公益阅读的长远发展。

公益阅读是让教育回归民间，以及开放教育重建教育的一种努力，在一段时间内，公益阅读的发展一方面将受到乡村学校和老师、家长、儿童的欢迎，同时仍将受到国家公共政策、应试教育观念、封闭的教育体系的影响，因此所有民间公益机构应该重视自身的完善和形象，同时应坚持不懈地为公益环境、阅读环境的改善而努力。

2. 加强分工和协作，不断提高公益阅读组织的专业化程度

经过了五六年的发展后，民间公益阅读机构需要逐渐告别简单的爱心驱动和理念宣传，告别简单的提供图书，而进化到提供立体化，专业化，引领型的系统阅读教育支持和服务。这些支持和服务包括，阅读管理体系，书香校园和书香班级建设方案，丰富的阅读课程和推荐书目、读本和相应资源，阅读种子教师的和志愿者的专业培训，阅读效果的规模和效果的科学评测，鼓励当地教师和儿童进行各种阅读创新和模式创新等。

不断提供专业化服务程度的关键在于加强民间公益机构的分工和协作。资助型基金需要建立更科学、有效、快速的项目测评机制，确保将经费拨付给确实需要资金，而且可以开发出专业的公益阅读产品的机构。运作性基金应不断提高公益阅读产品的策划和执行能力。公益机构应不断树立整合资源，优化流程，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机构去做的管理理念，为师资和志愿者培训，图书馆建设、图书购买和配送、阅读课程和活动研发等事务找到最专业的合作伙伴，提高运营效率。

3. 准确定位，坚持个性，不断提高公益项目和产品的策划和执行能力

公益阅读机构应致力于促进阅读教育革新和公共生活重建，尤其是乡村社会的文化社区建设。这就需要公益组织都要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从自身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出发，从自身特点出发，认准自己服务的对象的需求，坚持每个机构的个性，设计独特内涵的公益项目和产品，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是非常重要的。

是面向乡村还是面向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是通过学校渠道推广还是面向社区和家长推广？针对0-3岁的婴幼儿，还是3-6岁的幼儿，还是小学阶段的儿童，还是针对初高中生，大学生，老人？是重点做图画书的推广还是重点在文字书的推广？用传统的图书阅读还是数字阅读？将阅读推广和语文课程相结合，还是将阅读推广和生命教育相结合，还是将阅读推广和公民教育相结合？运用传统的志愿者和教师培训方式，还是充分运用网络和新媒体？如此等等。不断树立自己的资源，明确服务定位，才能策划出真正能实施有实效的公益产品。

4. 健全公益机构管理机制，吸收优秀公益运营人才，不断提高公益管理团队素质和运营水平

从近些年公益阅读机构的发展情况来看，成长迅速，发展稳健的公益机构都是因为比较有突出的公益策划和运作和管理人才。无论是资助型的基金组织，例如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心平公益基金会，还是运作性的阅读组织，例如真爱梦想基金会、担当者行动，新教育基金会，还是执行性的基金会，例如立人乡村图书馆，蒲公英乡村图书馆，都是如此。公益阅读组织要吸引优秀的运营人才，就必须不断健全公益机构管理机制。例如勾画明确和有召唤力的愿景，建立强有力的理事会和运营团队，给公益从业者提供比较合理的薪酬和培训、发展平台，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畅通无阻的信息渠道，项目评审和评估制度等等。

目前的儿童阅读公益组织机构建设大多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专业人才匮乏，志愿者系统不完善，不够稳定，筹款能力普遍不高，这一方面需要国家不断完善公益制度，需要提高全社会的公益意识，也需要公益机构不断提供从业水平，进而让公益阅读事业得到公众的认可，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阅读推广，尤其是儿童阅读推广仍将是教育公益组织的热点领域，是教育创新的良好途径，也是乡村重建、公民社会建设的一种思路。民间公益阅读领域大有可为，同时未来的路途遥远，需要更多的朋友们一起努力。

八、多元教育资源提供

（一）教育公益组织多元教育资源提供的社会背景

讲到西部农村教育，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西部教育资源的缺失。提起教育资源的缺失，人们又首先想到的便是硬件条件的不足和教师资源的欠缺。然而“硬件的投入和改善，只是改变西部地区教育落后境况的第一步……教育的核心，不在于先进的教学硬件资源（如多媒体设备、计算机机房、塑胶跑道等），而在于唤醒孩子们求知探索的兴趣，重燃孩子们追寻梦想的激情。”（引自“真爱梦想”）

在主流的教育中，分数与考试成了学生的学习主线，考大学几乎成为终极目标。传统的应试教育不但扼杀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创新力，同时也压抑住了他们对自身的认同和追求生活的激情。

当人们的目光集中在“出人头地”后，孩子们的成长之路便被限制在了一条无法逆转的单行线上。一旦一路的追求，换来的是对自我的否定、对家乡的忽略、对生活的失望，后果可想而知，那将是整个社会的消极。于是，关于“唤醒孩子”、“多元成长”、“乡土学习”等新型教育理念的项目便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事实证明，启发儿童的多元发展，能够促进和激发儿童学习热情、提高不同方面的学习能力，对未来的成长与就业都有十分巨大的帮助。

本篇提及的“多元教育”，既包含“多元智力教育”，也包含“多元文化教育”。主要阐述传统教育意义、传统教育形式以外的富于创新性和开拓性的新型教育模式。

就多元智力教育而言，其所谓智力，不是某一种能力或围绕某一种能力的几种能力的集合，而是相对独立、相互平等的8种智力，即言语——语言智力、音乐——节奏智力、逻辑——数学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身体——动觉智力、自知——自省智力、交往——交流智力。多元智力教育强调的是不以某一种智力为核心、通过多种形式的引导和挖掘，从而使儿童具备实践能力、激发创造能力。如“歌路营”的ARGO-综合艺术课。

而多元文化教育，则是在当前民族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其理论形成依据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自我文化传递和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流，形成了多种民族文化并存的“多元一体格局”。关于民族文化的项目案例，可参考“天下溪”乡土教材。

在这样的背景和认知下，国内民间学校教育领域及NGO教育领域纷纷尝试开拓新型教育，以期追求和挖掘教育的核心。如：真爱梦想的“梦想课程”、天下溪的“乡土教材”、根与芽的“绿色阳光行动”、阿福童的“理财教育课程”等，都是当下社会民间力量关于儿童多元教育的实践与展示。这些民间力量根据自身特点和自有资源开发了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多元教育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多元教育的发展、影响着国内教育的走向。

（二）典型多元教育资源提供的案例

1. 根与芽绿色阳光行动（环境教育）

“绿色阳光行动”是由珍古道尔(北京)环境文化交流中心暨根与芽环保组织发起，金佰利中国大力支持的青少年环境教育和拓展项目。该项目通过培训大朋友(志愿者)来带动更多的小朋友了解环境知识、培养环保意识。该项目用参与式的环境教育方式为青少年组建了一个课外活动的平台，并采取实际行动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绿色阳光行动”分别以“3R好生活”、“认识水危机，爱水、节水”以及“和大树在一起”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环保活动。比如，2008年，通过对日常垃圾的减量(Reduce)、重复使用(Reuse)、循环使用(Recycle)这三方面的宣传教育，鼓励青年人加强环境意识，采取行动减少垃圾排放，减轻环境负担。2009年，通过组织对北京众多地区水域的走访和水质的检测，帮助参与其中的同学们提高对于北京乃至全国水资源现状的认识，并通过活动成果展示，绘画比赛等多种形式积极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改善周围的水环境。2010年，在“保护树木”的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调查思考，学习了保护树木的知识，提高了自己的环境意识，并以自身行动影响着更多的人来关注环境问题。2011年，通过开展“追踪垃圾之旅”活动，带动城市中的在校学生深入社区，切实了解调查不同社区的垃圾处理情况，引导学生探寻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过程，并关注垃圾的分类和减量问题。2012年，开展“资源”总动员项目，通过“校园资源大调查”这一主线，带动同学们深入校园，探究资源使用和回收情况，找出问题所在，身体力行，将资源合理的进行循环利用，推广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理念。

在活动形式上，“绿色阳光行动”主要采用大志愿者指导小朋友和参观、访问、讨论、成果展示、分享相结合的方式。大志愿者指导小朋友是指鼓励并培训在校教师、社会志愿者，使其以引导员的身份带领并指导小朋友进行环境体验、环境研究等，最终达到大志愿者与小朋友共同参与、一起成长、为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目的。同时，大志愿者带领小朋友以参访形式深入农场、垃圾工厂或大自然各处，学习相关环境知识，了解当前环境状态；以校园为平台组织小朋友研究、讨论、宣传所见所感；并将研究成果以游戏、思维导图、手工制作等方式进行展示和反馈；且每年6月汇总当前活动成果，面向志愿者、小朋友及社会，完成分享和总结。

实施5年以来，“绿色阳光行动”影响了近60000年轻人，并改变了他们对环境的态度；并且培训了10000名来自国内各个学校的教师。

2. 梦想课程（生命教育）

“梦想课程”是由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发起的，一系列面向义务教育1—9年级，基于“全人教育”理念，融合问题探究、团队合作、创新创造、环境保护、情绪

智能等元素的跨学科综合素质课程。“梦想课程”的核心价值观为“创新、多元、宽容”，核心理念包括：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信任比帮助更重要。

“梦想课程”在纵向上分为1—3、4—6、7—9三个年龄段，在横向上分为以下三个内容模块：

“我是谁”模块注重培养孩子们对自我的认识，并通过认知自己来更好认知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

“我要去哪里”模块强调开拓孩子的视野与想象，认识到生命与世界的多元化；

“我要如何去”注重对孩子们的多元技能的培养，我们开设了职业人生与理财课，让学生们更多地了解周围的世界，了解有多少职业可以选择，选择这些职业需要付出哪些努力与代价。

在梦想课程的设计中，强调以问题导引的团队探究和以游戏达成的体验学习。老师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积极的提问者和鼓励者；学生不再需要记住名词概念，而是在思维的碰撞和活动的体验中感悟成长。“梦想课程”以培训当地学校教师为主要形式，以“梦想课程”为学习内容，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资源和机会；同时，以团队合作为主导，在课上对学生进行小组合作、调查、收集资料、动手实践等方面的训练。

截止2012年底，“梦想课程”已开发30门课程，“梦想课程”使师生关系更融洽、使老师们更热爱教学、使老师们获得更好的专业发展；开拓了孩子们的视野、锻炼了孩子们团队合作和创新探索等多元能力、让孩子们变得期待学习并享受学习、提高了孩子们其他学科的学习成绩。

3.天下溪乡土教育（乡土教育）

“乡土教育”是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的核心项目之一。用以培养当地学生对家乡的关注，对乡土价值的理解与认同，推动当地文化传承及可持续发展。2003年，天下溪以“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文化理念，开始在环境教育的项目地尝试，与项目地教育局合作，由一线教师参与教材编写乡土文化教材。

“乡土教育”的核心即为“乡土教材”。“乡土教材”以当地地理、历史、民风民俗、传统文化、资源、生计、经济发展等为主题，同时融入了天下溪特有的教育资源——活动与游戏。

在形式上，与当地教育局合作，培训当地教师，将“乡土教材”嵌入到当地学校教学环节中。教学形式为参与式学习，主要包括：调查研究、故事讲述、民族语言学习、互动游戏、实践活动、分享反馈等。同时，阶段性组织“夏令营”等课外活动。

近10年来，天下溪已开发《草海的故事》、《白鹤小云》、《霍林河流过的地方》、《与鹤共舞》、《扎龙》、《我爱拉市海》、蒙汉双语《家在科尔沁》、《奇奇格的故事》、《美丽的湘西我的家》及羌族文化语言教材《沃布基的故事》等多部乡土教材。

爱世界，从爱自己开始；热爱祖国，从热爱自己的家乡开始。“乡土教育”的意义在于，学生通过乡土知识的学习，能够深刻理解本地的生活方式与当地自然生态文化与历史的关系，并从中体会到本地的生活智慧和民族精神。“乡土教材”贯穿于“乡土教育”始终，使学生在在学习过程中提升了学习兴趣和生活能力，并深入了解了家乡的历史、文化和存在的价值，最终使学生既能走出家乡，也能留在当地更好地生活——这是目前国内西部助学机构尤为值得关注的一点。不过，民族文化项目的开发，首先需要对民族文化和历史有所钻研和了解，以及对民族语言的深入解读。这类项目对开发者的本土知识背景要求较高，如果不能很充分地结合本地人力资源，项目将无法达到预期目标，且容易产生文化误差。

4. 甘肃伏羲班（全面素质教育）

伏羲学校，即于2006年9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吴鸿清教授在中国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土桥小学创办进行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的“伏羲班”。学校同时吸收甘谷县山区部分贫困孩子就读，为贫困学生提供平等教育机会。“伏羲学校”的教育宗旨是以人为本，为学生终生着想。教学原则是首先教“作人”，强调培养学生的品德、理想、爱国精神和独立性，强调培养学生“有心、认真、勤奋、自觉”的意识。安排教学内容的原则是教给学生最有营养、终生受益的知识和技能。实施教学的原则是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少而精。

“伏羲班”开设6门课程：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英语（从三年级开始），各门课程按自主制定的教学计划教学，不受现行教育大纲限制。语文教学以《弟子规》、《三字经》等传统教材启蒙，三年级开始学习《论语》等古代经典和中外优秀诗文。要求背诵，通过背诵开发学生超常的记忆力；认字写字分开，一、二年级掌握常用字，使学生具备阅读能力。三年级学会写常用字，四年级开始学习写作；每天一节书法课，以此培养学生“五力”（持之以恒的毅力、专心致志的定力、细致入微的眼力、辩证思维的脑力、准确书写的手力），通过教学，使学生熟练掌握楷书书写技巧，基本掌握行书、篆书和篆刻的技巧；每天一节武术训练，增强学生体魄。六年中至少要掌握一套实用的武术技能；美术增加手工制作，由中国画线描起步，高年级开设素描；数学强调心算、增加珠算，培养学生灵活的思维能力；音乐增加民乐，至少掌握一种乐器。

在授课形式上，“伏羲学校”打破传统学校教育教学模式，采用“非主流”教材进行授课，并将多种教学形式贯穿其中。如：参与式、项目式、实践式。并将文体艺术课程作为主要课程之一。根据学生特点和成长需求，自主选配和编写教材、自主设置课程。如：《弟子规》、《三字经》、各类书法教材、艺术类教材、数学应用教材等。使得学生品德素质大幅度提高；普遍身心健康；热爱读书，思维活跃，记忆力普遍提高。考试成绩明显超过其他非实验班学生；书法、武术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绩，综合素质超过同龄人。

伏羲学校使“素质教育”不再是一句口号，良好的身心素质培养，对于孩子来说是促进其积极探索和学习的源动力。而现实环境中，大多数的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仍习惯将“本”与“末”倒置，使得孩子们学习过程压抑、学习兴趣丧失、身心走向消极。在不断的实践与摸索中，“伏羲班”实现了“素质”与“成绩”两不误，充分证明了二者可以兼容。不过，以学校为依托的完整的素质教育开展，如若不能将特色教育与传统教育有机结合，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尤其来自家长方面。

另外，多元教育并不仅仅是学术分组、交叉学科、改变学校日程安排或学年长度就可以进行的，多元教育的精髓体现在是否开拓了学生的能力。

5. 桂馨科学课（科学教育）

“桂馨科学课”由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发起，通过系统、持续和务实的项目实施。一方面提升项目实施区域科学教师的专业技能，推动当地小学科学教育教学进步；另一方面，助力我国小学科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时，提高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对小学科学教育关注和支持。

“桂馨科学课”是集教师培训、交流计划、科学实验工具箱捐赠、小科学家实验室捐建、夏令营、研讨会及论坛等一体的课程体系，课上以科学实验为主要教学手段。在教材选择上采取社会教材资源、自主创建的书籍。在具体的执行方面以县为单位，对全县的科学教师进行培训，帮助教师改善基础知识和教学技能，提升教师的综合能力 and 专业素质；同时捐赠乡村小学科学课教学资料《科学探索者》丛书、《科学启蒙》丛书、《走向探究的科学课》光盘和图书和科学课实验工具箱；对几县市的科学骨干教师进行更系统培训，进一步提升教师的综合能力 and 专业素质；同时捐建桂馨小科学家实验室，为一地区科学教师提供教学教研和探究实验平台。从参与过一、二阶段培训的科学教师中选拔优秀教师，前往江浙地区小学进行为期五周到二个月的交流学习；组织东部地区的优秀教师前往项目区域开展交流研讨、开展暑期科学夏令营活动。搭建项目区域科学课教师和东部发达省份科学教师常态化的交流学习、教学研讨、资源共享平台。

孩子天生具有好奇心，并有天然的动手能力和欲望。科学课程是孩子们走进生活、了解生活的一个窗口，也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内容之一。为孩子提供动手的机会、探究的机会、实验的机会，是将孩子们的好奇与热情保持住的好方法。如此的课程也使孩子们了解到，科学本身离我们并不遥远。客观地学习并理解科学，便能够客观地对待生活、面对世界。而实验本身，就是最好的学习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通过观察，此类项目从纵向的角度分析，的确可以起到以上所述的开发儿童潜力的作用，但从横向上观察可见其所触范围仅仅局限于学校内的科学课，而课程能否得到重视又完全取决于当地教育部门、当地学校对课程的重视。对课程的跟进和进展的

把握，还只停留在形式监控上。而且，智力是可以被开发的生理和心理的潜能，不该与学科相混淆。所以在学校以科学课的形式进行儿童智力的开发与构建，需要着重把握其中之度。

6. 歌路营青少年参与式艺术教育（艺术教育）

“青少年参与式艺术教育”是歌路营的核心项目之一。项目通过参与式艺术教育，帮助青少年开发感知觉、提升创造力、学习用艺术的方法表达自我，并为他们提供机会走进美术馆、大剧院等艺术殿堂，与各类艺术大师见面，从而增强其自信心、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

2012年8月至2013年8月开设“ARGO-综合艺术课”，通过多元、有趣的综合艺术手法吸引青少年，增强学生对艺术的感受力和参与，开打艺术视野，让青少年享受到艺术、参与到艺术的创作中的同时，提升青少年内在抗逆力的发展。主要活动与参与者有56名打工子弟，共开设美术、外出艺术、美化校园等课程24课时。2013年，歌路营进行了歌路营&美国旧金山世界音乐节工作坊和歌路营《音乐、乐器与儿童教育》工作坊。

歌路营的主要授课形式是课堂授课、室外活动、校园实践、体验式工作坊与艺术剧院参观相结合，以教师引导为主。采用自行开发的课程及教材，培养教师进行指导。截止到2012年底，歌路营已服务1790位教师、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农村学生、大学生等。

歌路营认为，艺术教育可以帮助青少年寻找表达自己情绪的途径、学习用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体验艺术带来的乐趣以及青少年内在的情感需求。综合艺术课的开发便是以此为基础。但是艺术教育等项目的开发，需要重点在其展开方式上做考量。也就是说，不是随意上一课、随意作画就能够达到开发智力的目的，这样的项目充其量算是艺术情操的陶冶，而非智力、能力的开发。

7. “阿福童”儿童社会和理财教育课程（理财教育）

百特的合作伙伴国际儿童储蓄基金会将Aflatoun引进中国。Aflatoun被评为全世界最好的前100个NGO之一。我们培训老师和学生，在他们的学校和社区中心开展Aflatoun课程。“Aflatoun”这个词来源于阿拉伯语，原意为“探索者”。“Aflatoun”也指柏拉图，作为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在许多哲学问题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以此闻名。他的研究范围包括道德、公民、社会公正、尊重、保守、友谊和关爱。在中国，“Aflatoun”被翻译为“阿福童”，意为快乐幸福的儿童。阿福童课程让儿童踏上学习的征程，在学习中感受课程内容和自己生活的关联。

阿福童课程是由国际非营利组织国际儿童储蓄基金会赞助的公益性项目。“阿福童”课程是提供给小学生的儿童社会与理财课程。课程特色在于互动性强，以儿童为中心来实施课程，容易被儿童接受。此套课程特别适合作为小学和初中的选修课程，

或者社区中心的活动课程。阿福童课程一套共有四册活动手册，根据不同年级使用不同的活动手册。认识自我并探索自我、权利与义务、储蓄和消费、计划和预算和社会融入和创业是阿福童课程的5个核心理念。

在实际执行中，阿福童课程与城市学校、打工子弟学校的学校教育相结合，在学科教育中穿插开展社会生活化课程。主要形式为课堂授课式、互动参与式、小组合作式、校外实践式。并通过教师培训，达到课程持续的目的。

截止2012年有36042名儿童参与（75%是弱势群体），2884名老师接受培训，663名大学生志愿者接受培训，86所学校参与项目，项目覆盖全国36个地区。

阿福童教育弥补了国内教育对青少年理财、就业及未来规划方面的空缺，并在几年内将课程推广至全国多个省市。在一系列的课程开发及系统维护过程中，阿福童使“理财”概念在青少年教育层面上得以传播。它不同于常见的智力开发及文化教育，它注重的更多的是对生活规划的能力。任何与学校相结合的课程，最大的需求都是获得本地教育部门的认同，方能顺利将课程持续或发展，所以此类项目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获取支持。

（三）教育公益组织多元教育资源提供项目的发展趋势及问题

由于特征的单一性、资源的局限性，各项目在开展过程中也面临着种种挑战、逐渐暴露出不同程度的问题。尤其是民间环境内，信息不能共享、机构间各自为战，致使资源无法被有效利用和开发，生命短暂；在机构生存的压力下，也有项目陷入了“创新”的怪圈，而忽略了课程系统性和服务规范性，徒有其表；项目落实方面，尤其西部农村地区，教师力量薄弱，外援人力又无法持续，倘若缺乏教师培训机制，再精华的项目也唯有束之高阁；另外，由于非传统形态的教育模式，目前并未在社会上达到普遍的认知与认可，如何获取社会力量的支持也是一项值得为之努力的挑战。可喜的是，当下正有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公益组织及个人参与其中，观察与努力并存，中国的民间教育在多元教育资源提供上一直在调整和自省中不断前进。

九、职业教育

（一）教育公益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背景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职业教育在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和素质的同时，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然而，费用的负担和教育资源的缺乏使一些弱势群体接受职业教育受到限制。20世纪初，不断有公益组织加入到中等职业教育的提供中，如百年职校、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休宁木工学校等。2012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根据《行动计划》，我国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逐步实行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方面，《行动计划》提出，保持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扶持建设紧贴产业需求、校企深度融合的专业，建设既有基础理论知识和教学能力，又有实践经验和技能的师资队伍；逐步实行免费中等职业教育。由于国家财政不断加大对免费中职教育的投入，公益组织办学的服务对象和办学模式发生转变。百年职校先后在全国复制9所学校，并探索与地方合作办学的模式，值得探讨和借鉴。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城市已经容纳了1亿4735万流动人口⁵，农民工子女和农村贫困青年的继续教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很多青少年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由于年龄小、学历低、无技术，只能从事初级的体力劳动，或者漂泊在城市，甚至沦为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而社会迫切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工人，政府也将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今后教育发展、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

职业教育的困境在于它的投入成本远比普通教育高，而且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从全国情况来看，2005年中等专业学校学费为人均2089元/学年，普通高中为1150元/学年，前者是后者的1.82倍。另有调查显示，湖北省2005年在校农村生源中职学生学费占其家庭纯收入比例接近50%，负担之重可见一斑⁶。在目前的体制和环境下，城市学生不屑于学职业技术，中职招生严重不足；而需要获得这一机会的贫困农民子女又无法、无经济能力参与这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需要一个大的发展，但是需要的是新的发展思路，是体制和机制创新，是更大程度的市场化、社会化⁷。

5 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http://www.gov.cn/gzdt/2006-03/16/content_228740.htm。

6 黄辉，愿助学新政拉动中职前进[J]，职业技术教育，2007（37）：65。

7 杨东平，“百年职校”的五重价值，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471c8010002w1.html。

（二）典型公益职业教育案例

我国是农业大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子女和打工子弟成为我国社会阶层当中的弱势群体。农民的孩子出路在哪里？这个难题也成为各个公益组织共同探索的问题，而教育被认为是改变农民孩子家庭经济和生活环境的根本出路，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到职业教育。工业化社会需要有效的职业教育，一方面调整教育结构，提高职业教育在高中教育中的比例；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以职业教育解决农村青年的就业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参与职业教育，如中华职教社、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北京富平学校、国际计划等非营利组织通过参与学历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以及理论研究和政策倡导等方式参与职业教育⁸。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1998年10月，北京“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创建，成为中国第一个为中国西部和贫困地区最没有发展机会的贫困农村妇女和女青年提供免费培训的机构；北京富平学校成立于2002年，以“民办公助”的模式，通过专业技能培训、互助公益网络支持和后续服务等方式，帮助中西部贫困家庭的女性在城市实现体面就业和发展。截至2011年12月31日，培训就业了21400名家政服务员，其中90%来自偏远山区，累计为11600余户北京市居民提供了放心、专业、有保障的家政服务。在学历职业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百年职校、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和休宁鲁班木工学校。

1. 百年职校

“北京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百年职校）由企业家姚莉女士发起，于2005年9月在北京建立，并被确立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资助定点学校。百年职校是中国第一所免费职业教育学历学校，专门招收贫困青年、贫困农民工子女和贫困青年农民，帮助他们免费接受正规职业教育，其办学理念是将学生未来长期发展所需的人生技能培养和当前就业所需的职业技能训练的相结合，旨在培育受企业欢迎的一线技术工人。截至2011年9月，北京百年职校共为778名贫困年轻人提供了公益全免费职业教育机会，共423名毕业生合格毕业，始终保持着100%的就业率，可以体面尊严的在社会立足，个人及家庭的生活环境与质量均得到显著改善。2009年以来，百年职校开始复制和推广公益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至今为止，北京、成都、郑州、武汉、三亚、南京、武汉、银川均已建立百年职校，并与丽江民族中专合作开办“百年职校希望工程护理班”，为中国贫困农民家庭提供免费职业教育，解决其子女的就业问题。

8 李凌，非营利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途径、特点和建议[J].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 2012年第26卷第3期。

案例剖析：百年职校

据有关调查显示，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返乡务农或外出打工。由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职业教育，无一技之长。他们尚难以成为合格的劳动者，个人难找工作，家庭难以脱贫。

我国从2001年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即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大量农民家庭子弟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因无力接受正规的职业教育而遭遇就业困境成为迫切的现实社会问题。2005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促使企业对专业技术工人的需求急剧上升。姚莉女士在成功创办企业成功之后，有创办学校的愿望和回报社会的情怀，同时，她的身边有一些和她一样有公益诉求的朋友。鉴于当时我国职业教育落后的境况，姚莉在基于做企业过程中对于专业技术人才质量低下等问题的总结的基础上，发起、创办了百年职校。学校提供为期两年（其中一年的学习是以实习的形式在实习单位展开）的免费中等职业教育，为贫困农民工子女和青年提供正规、免费职业教育的机会，同时，这种两年制并加入实习的学制安排，将教育成本降至为零。2006年，经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委员会批准，百年职校取得中等职业教育资格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并于东城区民政局完成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学校以在全国部分主要城市举办的“（地名）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为具体的组织形式，2009年在成都开办了第1所百年职校，2010年开办了4所，2012年开办2所，2013年开办2所，现在共有9所百年职校，每所学校每年招生不超过100人，并根据当地师资力量和市场需求确定3个开设专业。经过8年的发展，百年职校不但成为一个品牌的职业教育机构，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公益办学模式，更成为一个面向全社会的慈善教育公益平台，广泛吸纳基金会、企业、政府部门、公益组织及个人的公益资源，从而为更多的贫困青年提供免费、正规的职业教育。

1、“强化管理促可持续发展”

（1）独特的治理结构。在治理结构方面，百年职校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理事会为各地百年职校的决策机构，行使决策权，主要职责是动员社会资源、保障和促进百年职校的发展，理事会成员均不从百年职校领取任何报酬。因此，发起理事的实力决定了筹资的实力，主要是姚莉身边的一些企业家朋友，现在每年的筹资金额在2500-3000万。充足的运作资金及资助者对工作结果的关注，使得内部的管理压力上升。这就要求百年职校不断地改革和创新，将工作落到实处，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由理事会聘任的校长作为实际负责人，主管教学与学生工作，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如：处理学生的方式要符合百年职校的理念和价值观，老师对教学的指导不能照本宣科，对实习单位的选择不能偏离百年职校的选择范围等。业务上，百年职校接受各地业务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面向市场自主地开展中等

职业教育，并欢迎社会各界的建设性参与。

(2) 科学的预算制度。经过多年的运营，百年职校测算出教学当中的费用标准，学校可以根据业绩指标进行预算配置，根据每年的招生人数，很容易就可以计算出预算。每所百年职校拿工资的全职工作人员在10-12人，9所学校120人左右，每年招生100人，学生书本费、校服费、纸笔书本等开支，工作人员工资、社会保险等费用，课时费，实操室的耗材开支及学生活动计划开支等。每年每所学校的运转经费在180-200万。百年职校会打出两年的筹资时间差，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目前已经在筹集2015年的资金。

(3) 市场化办学导向和人生技能培训。当前社会仍然缺乏有专业技能的年轻人，百年职校毕业生100%就业的优势首先在于以市场化为办学导向。根据学生的学业基础和市场的就业需求，学校在充分调研和反复论证后，设置了电工及综合维修制冷空调及管工物业及酒店服务、西点制作、中餐烹饪、幼儿助教等课程。为保证学生顺利就业，学校除努力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外，还主动联系积极争取当地的相关企业单位作为学校的办学合作伙伴。这些伙伴单位不仅为学校提供相应的教学支持，如提供专业课程的师资与教学服务，而且为学生提供为期一年的实习机会甚至就业岗位。同时，百年职校的优势还在于其培养目标是受到企业欢迎和认可的、能够在社会上可持续发展的专业技能人才。学校围绕受企业欢迎，30%的课程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解决就业的敲门砖问题，针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百年职校提出用70%的课程对学生或者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人生技能培训，即life-skill，例如，打扫卫生、化妆着装等，通过人生技能培养让学生打开眼界。

(4) 重新定位和模式创新。从2011年开始，理事会根据生源情况的变化和企业需求的变化，对百年职校进行重新定位。2008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及北京奥运会、建国60周年等一系列活动，在京农民工收入大幅度增加。百年职校的生源中务工人员子女的比例逐年下降。由于学校之前无法提供住宿，河北张家口、张北、廊坊等地的贫困农民子女的比例逐年增加，学生从贫困、弱势转变为相对贫困、相对弱势，由北京为主转为以北京周边为主。此外，许多九零后特别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的教育方式也发生着变化，偶尔回家的父母的溺爱和隔代的溺爱使许多“农二代”、留守儿童成为最受溺爱的群体。这些青年既缺乏正常的家庭关爱和教育，同时也享受不到优质的义务教育资源。基于这些变化，百年职校帮助农民工子女或贫困孩子解决就业、找工作的目标基本得到实现，学校的培养目标转向让这个特殊群体的学生能够在社会上立足和可持续的发展。百年职校投入大量的精力协助每一个学生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属于自己的钥匙，这是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所忽视的。首先，百年职校平等、尊重和富有爱心的氛围，让学生感受和认识到关爱；其次，百年职校注重教师的垂范，不鼓励老师要求学生做自己都做不到的事，老师以身示范；此外，注重实践，不主张大道理、大理论的灌输等。

不断改革和创新，尝试新的复制模式。百年职校原来的复制模式是直接在一个地方投资一所学校。2009年11月12日，丽江民族中专百年职校希望工程护理班开班仪式在丽江民族中专举行，该护理班是百年职校与丽江民族中专的公益合作项目，学生在丽江完成一年半的学习之后，百年职校将安排他们到北京进行学习和实习，帮助他们就业。丽江合作模式的创新，使合作办学成为百年职校的另一复制条件，有效地整合了地方的社会资源，在解决注册、校舍、师资等问题的同时，把百年职校所开拓的职业学校的第三条道路拓得更宽、更长。

百年职校还有一些尝试和创新，如教学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要，教授就业实用的技能；通过打扫卫生等人生技能培训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进入企业后放下身段，即使什么工作都不会，最起码可以从打扫卫生做起。

2、“百年模式”的创新性

百年职校的创办者和支持者通过公益力量举办职业教育服务贫困年轻人，摸索出一条独特的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即公益全免费职业教育模式。“百年模式”的范本价值可以从四个层面来总结。

(1) 搭建公益平台，推广公益理念。百年职校以学校为公益慈善平台，有效动员社会资源，得到政府部门、基金会、企业、高校、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大力支持，探索出一条慈善公益职业教育的道路。同时，百年职校的办学义举本身是一种公益理念、奉献精神的推广，是对更多企业家和社会力量回报社会的号召。

(2) 坚持市场化的办学导向，专业设置的适应性强。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对技术人员的需求瞬息万变。百年职校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就业目标为导向，在专业设置、教学改革等方面自主创新。同时，争取与相关企业单位成为办学合作伙伴，企业参与教学过程、主导教学方向，并提供为期一年的实习机会，甚至就业岗位，为学生充分就业提供保证。

(3) 重视能力转变与技能提高的同步开展。针对部分贫困青年或打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没有养成良好习惯，以及企业中技术人员普遍素质不高的现实情况，百年职校在职业教育中重点开设了德语课程教育。百年职校的教育重在人生技能培育，强调学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细节管理、过程留痕、环境育人等方式，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良好习惯、健康心理和人文素养，旨在帮助学生学会做人、融入社会、适应岗位并且面向未来发展。

(4) 创新复制条件。2009年开始，百年职校以直接投资办学为复制条件，陆续在全国各主要省份复制8所学校。此外，与丽江民族中专的合作则是以合作办学为复制条件的一种创新与探索。这种复制条件既降低了直接投资办学的成本，同时发挥了地方职业学校的地缘优势，有效地整合了地方资源，扩大了百年职校教育提供的覆盖面。

2. 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

“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由吉美坚赞于1994创办，是青海省第一所民办福利学校。学校专门招收藏区农牧民失学、超龄青少年，全部学生免收学费。2006年3月被吸收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团体社员，并列入中华职业教育社“温暖工程”青海试点项目工程。吉美坚赞与众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有教无类，公益办学。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是当地唯一一所僧俗融合、学生年龄不一的男校。目前800名学生中，约有僧人280名，学生年龄最小的十多岁，最大的三十多岁，为少年失学的成人。生源来自青海、四川、甘肃、西藏四省区的60个县。学校不收任何学杂费和住宿费，孤残儿童、特困儿童还可以得到适当补助。为满足草原深处牧民女童的教育需求，2005年又创办民办公助的“拉加草原女子学校”。

(2) 注重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汉藏教育的融合。让僧侣接受现代教育，让普通学生接受藏民族传统教育，学校开设因明学、藏语语法、修辞学、天文历算、声律学、辞藻学等藏文化传统课程，重视背诵经典，重视诗歌写作。

(3) 引入藏地寺院“辩经”的教学方式，通过因明学打下逻辑和推理能力的基础，探索适合藏族学生的新的教学模式。学生每天上下午在操场各辩论半个小时，包括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等不同形式的辩论，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逻辑思维、分析和认识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

(4) 学业成就和就业率高，得到社会认可。吉美坚赞学校毕业生高考升学率与当地同类学校相比遥遥领先，在已毕业的561名学生中，上大学的207人（29人到国外读书），医生17人，教师69人，寺管79人。

3. 休宁鲁班木工学校

“休宁鲁班木工学校”创办于2003年，由美籍华人聂圣哲先生发起，江苏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捐资，与休宁县职业教育中心联合创办，是中国第一所木工学校，首创世界职业教育学位一匠士。休宁县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不足，每年约有50%的农村初中毕业生不能进入普通高中继续学习，鲁班木工学校有效弥补了职业教育资源。学校有鲜明的办学特色：

(1) 育人教育为根本。学校以服务“三农”为宗旨，招收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在校学习三年，接受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木工技艺教育，培养成德艺双馨的木工手艺人。学校把育人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先育人，后学艺”的教育理念。

(2) 实训教学是基础。学生70%的课时用在实训车间学习手艺，从劈、刨、锯、凿到制作木制品，最终独立制作八仙桌和太师椅才能毕业。

(3) 校企联办是保证。采取“校企合作，一校两制”的办学模式，即德胜捐资在休宁第一高级职业学校内创办木工学校，木工学校的教学管理、办学经费、教育理念等均有德胜负责，在同一个校园实行两种办学体制和两种教育管理机制。

(4) 毕业生服务当地经济建设。截止2008年学校共培养毕业生161人，其中获得木工匠士学位145人。木工学校的优秀毕业生除了去大城市就业之外，还可以扎根当地，参与当地的经济建设。

在为弱势青少年群体提供具有社会救济功能的中等职业教育的实现路径上，百年职校开创了政府和企业办学之外的第三条路，即第三部门职业学校。对百年职校办学模式、产权结构、治理结构等的解析和总结，可为我国第三部门中职教育和教育慈善公益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借鉴。

(三) 教育公益组织职业教育项目的发展趋势及问题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推进城乡、区域合作”、“办好面向民族地区的职业学校”。2012年11月13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宣布实施农村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将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扩大到所有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发展趋势

现阶段教育公益组织参与职业教育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关注弱势群体，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和工作技能。公益组织在满足弱势群体的社会需求、解决一些长期性的社会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直接服务于贫困年轻人，通过对学生进行生活和职业技能的培训，提高其个人能力和自信心，增强其就业能力，从而改变家庭经济和生活环境。

第二，免费正规职业教育，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毕业生除获得第一次就业机会，还可因具有中等职业教育学历而为日后深造奠定基础。

第三，面向全社会的公益平台，广泛吸纳社会公益资源，与基金会、企业、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及个人开展合作。

在这样的基础上，未来公益参与职业教育的可为空间主要在于：

第一，构建多元参与的职业教育体系。由于产业和行业门类众多，职业教育更需要企业和社会的参与。在公共教育服务中，第三部门职业学校提供了除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意外的第三种资源配置机制——社会合作机制。公益组织是一个面向全社会的公益平台，应加强与政府、公益组织、基金会、企业及个人的交流合作，构建多元参与的职业教育体系，打开第三部门职业学校的新格局，努力为更多的弱势群体提供覆盖面更广、层次更多的职业教育培训。

第二，探索多元的办学模式。多元的办学模式能够提高对社会资源的整合效率，同时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教育服务。免费的公益职业教育对办学经费、教学资源的要求较高，活动经费少的公益组织无力举办，公办民助、获得政府购买服务及校企合作办学等办学模式值得探索。如，休宁鲁班木工学校“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探索“一校两制”的制度，百年职校在直接投资办学的复制模式基础上探索“地方合作办学”的模式等。

第三，开设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专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人才。职业教育相较于大学教育更有活力，更适应市场的需求。大学教育培养的人才很难再回到农村服务和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责任更多地寄托于职业教育。公益职业教育要从地方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出发，大胆开设相关专业，培养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专业人才。

第四，重视项目监测和评估。2011年，郭美美事件为标志，中国慈善进入公益元年，提高公益组织对项目透明度和监测的重视。同时，及时的项目评估是对项目的投入、产出、效果、影响和可持续性等问题的把握和分析，有助于提高项目效果。

2.问题与挑战

公益职业教育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困境：

(1) 传统的教育观念根深蒂固，致使招生困难。中国的正统教育是精英教育和应试教育，无法解决农民教育问题和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而中国最需要的职业教育一直被视为“二流教育”、“次等教育”，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困难。

(2) 职业学校招生质量低，缺乏招生选拔与培养淘汰机制。免费中职教育的生源主要为贫困青年，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良好的义务教育，或形成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给学校的管理造成压力。同时，贫困是大多免费中职学校选拔的主要标准，建立多元的招生选拔机制和科学的培养淘汰机制有利于公益中职学校提高招生质量和学生的培养质量。

(3) 办学经费投入大，一般公益组织无力举办。许多孤儿、单亲子女、父母残疾子女等弱势群体单纯依靠免费中职教育仍然捉襟见肘，对于免费中职教育的需求仍然很大。然而职业教育对师资、经费要求高，缺乏专业性和资金实力的组织通常无力举办。中等职业教育成为国家财政全额支付对象之后，形成一定购买服务空间及资源条件。

(4) 农村、农业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落后，人才难以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目前，中职教育培养的人才大量外流到省会和大城市，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具有职业技能的人才。中职的发展应当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培养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

(5) 区域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缺乏优质职业教育资源。

十、研究与倡导

（一）教育公益组织从事研究倡导的概况

所谓研究，是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所谓倡导，是针对某些公共话题或政策议题而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付诸行动争取主张成为现实的过程。政策倡导则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和制度内影响公共政策和有关公共资源配置决定的一系列努力。有效的倡导需要有力的研究，有力的研究有助于倡导的有效实现。真正的倡导离不开扎实的研究，基于研究的研究更易于目标的达成。

在西方国家，研究与倡导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在纷繁复杂的政策倡导中，利益集团的倡导对政治过程的影响最为显著，西方已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倡导机制。当然，这建基于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之上。在我国，随着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公民参与制度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组织的研究与倡导职能逐渐丰富起来，并慢慢作为“民意”的代表，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认同。从长远来看，研究与倡导十分之必要，它区别于简单的“提供服务”，它能够使“服务的提供”更加有针对性，更加能有效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弥补政府的“缺位”或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与倡导——作为重要的公共职能，理应成为每一个公益组织的内在使命，理应牵引着每一个组织的运行与发展。因为，这是我国民主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二）研究倡导公益项目的典型案例

从整个教育公益组织目前的规模和发展现状来看，研究与倡导类的教育公益组织为数甚少，约占2%左右。当然，这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也跟目前我国公益组织发展的阶段性有一定关系。在这为数不多的研究与倡导组织中，根据其研究与倡导职能发挥的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为代表的专门从事教育政策研究与倡导的，以香港乐施会为代表的兼具研究与倡导职能的，以新教育研究院为代表的通过行动研究服务教育创新的。

1. 专业化的政策研究倡导

在教育领域中，专门致力于研究倡导的NGO组织数量不多，很多教育公益是把研究倡导作为一项工作来进行的，而非仅仅从事政策研究和公共倡导。目前专门从事教育政策倡导和研究的主要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长江教育研究院、奕阳教育研究院等。

这类教育公益组织的工作内容，一是关注教育政策和相关公众话题，通过媒体传播，推动公众参与；二是以调查、研究、传播带动行动，致力于改善教育的宏观环境。这类机构大都近三四年间才出现，尚在萌芽状态，其中表现比较突出的有北京的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奕阳教育研究院、湖北的长江教育研究院等。这些机构的工作，在高度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之外，汇聚起教育变革与创新的社会力量，推动自下而上的尝试与突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使命是“以独立视角研究教育问题，以社会力量推动教育改革”，其目标定位于成为国内“最具公信力的民间教育智库”。2012年，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成立十周年。十年来一直坚持民间立场，独立视角；坚持促进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变革；坚持社会参与，公众倡导。研究院的工作获朝野重视和认可，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一是影响国家政策法规的制定。深度参与2002年制定《民办教育促进法》，2006年修订《义务教育法》，2010年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与改革规划纲要》。2009-2010年，围绕《教育规划纲要》制定，公布民间版《规划纲要》，一些重要理念被采用，如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目标、“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高考制度改革等。2010年出版《2020：中国教育改革方略》，成为教育官员的重要读物。二是推动地方政府的教育制度创新。2008年举行第一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到2012年为第三届，对地方政府教育行为有重要影响。参与了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成都武侯区等的教育规划工作，实际地推行新的教育治理观念。三是关注重大教育问题，通过影响媒体和公众参与推动改变。围绕突出教育问题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引爆”若干议题，例如奥数教育、大班额、北京小升初、在家上学、农村撤点并校等等。研究院成为CCTV、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教育议题、资讯的重要来源。四是倡导新的教育理念，观念更新和启蒙。21世纪教育沙龙、新民教育讲坛，两会教育沙龙、《教育信息双周刊》，年度教育报告《中国教育蓝皮书》（2003-2012）、系列电视节目策划等等，对公众的举行传播和倡导。因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形成了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与媒体的深度合作和公众参与影响教育发展的工作模式，影响力是全方位的。

长江教育研究院成立于2006年底，在湖北省教育厅支持下，华中师范大学和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发起，由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办。长江教育研究院是以政府指导为原则、学术研究为基础、教育文化出版为支撑的，发挥“政、产、学、研”各自优势的新体制的研究机构。该院成立近5年来，探索新的体制与机制，组织了一支队伍，凝聚了一批专家，开展了课题研究，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教育咨询研究报告12份、教育政策建议书3份；公开出版《中部教育论》、《教育热点难点解读》、《中国教育黄皮书》（2010、2011）等教育著作（《中国教育黄皮书》已成为研究院的品牌出版物，每年一本）；以科研带动研发教材百余种。与集团“现在网”联合打造“在线教育”频道，尝试利用网络开展科研活动。特别是持续进行了教育政策研究活动，也在全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奕阳教育研究院（Sunglory Educational Institute, SEI）成立于2006年，专注于学前教育基础理论与实践应用研究。SEI恪守兼容并蓄、严谨客观、思想独立的学术精神，坚持非营利、重践行、求共赢的公益之道，采用“基金会+研究院”双轨运作的模式，灵活开展自主研究、合作研究、资助研究。SEI以“博闻·智识·公信·通达”为理想与使命，集纳先进教育理念，形成学前教育理论的民间智库，打造专家学者、行

业领导者、教学实践者交流共享的公共平台。奕阳教育研究院主持、参与学前教育公共政策及产业发展研究，倡导学前教育行业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工作重点涵盖：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意见征集；组织召开围绕学前教育政策和制度改革的系列研讨会；起草并发布《儿童优先：实现学前教育的战略发展》专项报告；参与地方教育制度和实施模式的探索，促进主管部门优化政策环境；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学术交流、国民阅读推广平台。同时，开展“新课程·新实践”学术峰会、“新视野·新思维”等专业论坛。

表1 专业化的政策研究倡导机构

典型机构	核心人物	倡导内容	载体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杨东平	1.优化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治理方案 2.研究国家政策的实施情况与推动地方教育治理创新 3.推动公众广泛参与教育改革的政策治理	出版物：年度教育研究报告（《中国教育绿皮书》），书籍、颁奖、期刊文章、报告、政策简报、报刊文章、视频及门户网站，微博等新媒体。 形式：高峰论坛、学术研讨会、讲座、教育沙龙、学术资助等，开展公众讨论，进行教育传播和推广。
长江教育研究院	周洪宇	教育咨询研究报告12份、教育政策建议书3份；公开出版《中部教育论》、《教育热点难点解读》、《中国教育黄皮书》（2010、2011）等教育著作（《中国教育黄皮书》已成为研究院的品牌出版物，每年一本）；以科研带动研发教材百余种。	出版物：年度教育研究报告（《中国教育黄皮书》），汇集研究院教育政策研究成果。 形式：从2007年开始，长江教育研究院每年“两会”前在北京召开“长江教育论坛”活动，邀请国内著名的教育专家共同探讨教育改革与教育发展问题。
奕阳教育研究院	高峡 张守礼	1、中国学前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 2、农村幼儿园的建设与发展 3、地方学前教育改革与创新 4、流动儿童学前教育支持	建议书：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合作《儿童优先：实现学前教育的战略发展》；杂志《奕阳幼教评论》。 研讨会：“农村儿童学前教育探索：公益组织案例分享会”；“流动儿童学前教育发展论坛”。

2.兼具研究倡导职能

根据研究与倡导职能发挥的程度，此类机构并非是专业化的从事研究倡导的机构，研究与倡导只是他们的部分职能。换言之，在某些教育领域，他们根据自己所熟知的服务领域和范围，力所能及地作了相关的研究，并面向社会公众发起了某些倡导。以香港乐施会、“贵州人公益行动网络”等为例，类似这样的机构数量也并不多。

香港乐施会一直以来资助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中国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蓝皮书》是反映中国教育状况的年度性报告，主编为杨东平教授，写作团队主要由国内高校、教育研究机构、新闻媒体的中青年教育学者、记者等人员组成。《中国教育蓝皮书》致力于从民间的立场和视角来透视、研究、记录中国教育问题，致力于教育公共政策的研究，聚集教育界内外的民间智慧，从而积极地参与和影响教育现实，推动我国教育变革。2008年起由荷兰BRILL公司发行英文版，成为海外了解及研究中国教育的重要文献。通过《中国教育蓝皮书》，香港乐施会达到了开展政策倡导，推动教育变革的目的。此外，香港乐施会长期关注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他们的中国教育团队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用翔实的数据反映了集中资源办学、撤点并校政策给农村教育带来的大量问题，形成人大、政协的提案，提交政府主管部门。2009年，在他们提交的《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建议》中，对撤点并校、乡土课程、复式教学、双语教育和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都提出了切实的政策建议。

贵州人公益行动网络（简称贵州人）是一个非政治、非宗教的公益机构。“贵州人”通过组织和开展与河流保护、自然教育、乡土教育等相关的活动和项目，促进个体在行动中反思与成长，保持积极、向善的美好情感；探索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创建以来，组织开展了贫困学生资助、图书室捐建、校舍等硬件设施援建、河流保护、环境教育、自然体验活动、志愿者交流、主题研究以及捐赠义卖等项目和活动。在这些项目活动之余，“贵州人”十分关注农村地区撤点并校政策对农村教育的影响，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资助，他们历时半年多，对贵州剑河县28所中小学多了调查研究，形成了《剑河县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实施进展及其对当地义务教育发展的影响调查研究》报告，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对策，提交了相关职能部门、研究机构及相关人员。

2012年5月31号下午，十一家关注儿童公益事业的机构和众多公益慈善组织的朋友们相聚在北京二十二院街艺术区，举办“关注困境儿童”倡导会，共同发出“‘六一’儿童节让我们关注困境儿童”的联合倡导。参会的有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儿童乐益会、北京益仁平中心、“为中国而教”、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摩登天空·“无花果”民谣厂牌、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等。

倡导会提出“让公益机构形成联盟，让困境儿童的母亲们求助有门”的建议。

3.以行动研究服务教育创新

区别于上述两种研究倡导机构，此类机构所做的“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或政策倡导，而是一种扎根实际工作的“行动研究”——在行动中研究，通过行动研究，研究是为了行动。他们所做的行动研究，最终是为了服务他们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或实验，在行动中积累改革经验，推动教育创新。苏州的新教育研究院、北京的新学校研究院等就是这种典型。

2002年，朱永新创建并发起倡导教育改革运动——新教育实验。新教育研究院是新教育实验的组织和管理机构，在苏州注册，院长由翔宇教育集团卢志文总校长担任。新教育研究院下设新教育研究中心、课题管理中心、教育在线网站（www.eduol.cn）、网络师范学院、《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教育研究与评论》杂志、培训中心等机构。新教育研究院因强调教育者自身的行动反思，以及对社会公益的热心关注而倍受瞩目，形成国内著名的教育公益。新教育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目前拥有中国新教育网、新教育报、中国新教育发展论坛年会、中国课改名校联盟、中国教育记者俱乐部、中国新教育专家报告团、中国新教育新闻节等8大教育品牌，聚集了包括教育部、中国教科院、中国教育学会、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刊社、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学校等单位的领导、专家、记者、局长、校长、教师等资源，拓业宗旨是“用思想造福教育”。根据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需要，输出思想，会诊号脉，指导发展。

新学校研究院是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领导创建的。全国新学校研究中心直属专业从事全国新学校重大科研课题研究、项目实施管理、教育科研成果转化的唯一指定教育机构。新学校研究院在“新学校”理念的指引下，致力于母语教育的行动研究；推动区域教育的国际化、专业化发展，输出“新学校”解决方案；创办中国基础教育资源交换中心，打造中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教育资源分享平台。北京新学校研究院目前承担着教育部、人事部“园丁工程”、“特级教师计划”“语文主题学习”以及“区域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动力计划”等项目的推广及实施，同时负责“中国青年教育家”系列图书的策划出版及组织承办“中国当代教育名家讲坛”系列报告会等工作。经过多年的发展，研究院秉承“把我们的行动拿出来研究，把研究的成果付之于行动”的核心理念，与全国20多个省（市、区）50多个地（市、县）教育局以及2000多所学校建立了教育输出及交流等联系，同时与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旧金山城市学院、洛杉矶奥海谷学校等多家国际化机构和院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三）研究倡导公益项目的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

1. 基本特征

作为第三方的教育研究与倡导机构，与体制内机构不同，此类公益组织拥有较高的公信力，能够充分代表民意，是一股潜在的重要的力量。总结起来，具有以下几点基本特征。

第一，搭建平台，代表民意，凝聚社会力量，推动教育微改变。教育公益组织通过研究与倡导职能的发挥，不仅本身就是一种民间进步力量参与教育治理的有效机制，而且它还在动员、教育公众理性参与教育治理方面发挥公共资源的整合功能，为习惯了在政府与学校之间开展治理服务的理论界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提供有益的经验参照。

第二，研究与倡导基本上是“专家型”研究倡导。我国确实存在着倡导的空间，然而知名学者和“官办”非政府组织才是最容易利用这种空间的人。我国目前的倡导“仅仅是以个人维度存在的，而不是以组织的方式”，“草根非政府组织们看起来非常善于倡导，但实际上只有当他们与政府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能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也赞成“官办”非政府组织拥有更多的倡导途径，但是他认为其中很多组织缺乏积极性，或者说，其中很大一部分不愿意进行倡导。草根非政府组织从本质上来说却更加倾向于采用倡导但是却缺乏与各级政府进行沟通的平台。

第三，倡导方式多样，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所有类型的组织都非常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将它看作宣传的一种主要手段。通过舆论倒逼政府政策改变，是目前一种比较有效的政策倡导方式，此外，他们会通过组织网站；组织定期出版物，比如杂志、通讯；公共活动，比如展览；会议或者论坛；人际宣传或者项目合作；调查报告或者政策研究；学校教育或者其他等方式开展政策倡导。

第四，形成初步的内部治理结构，但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组织规模与运行模式依然不够稳定和“制度化”，不仅组织规模有限，而且主要依赖创始人及核心成员的“志愿精神”与“社会资本”，以争取活动所需的资源与人力，尚未发展成经济基础稳定、真正拥有专职研究员、内部治理机制健全的公益性教育研究机构。上述局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教育非政府组织的制度生长环境需要改善。在扶贫领域，非政府组织目前已可以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竞标。但在教育领域，非政府组织连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机会都没有。

2. 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中国教育亟待变革，公众呼声高涨的背景下，此类教育公益组织的民间立场、独立性和专业性公共政策调研，潜在的社会需求巨大。部分此类教育公益组织已经形成“民间教育智库”的雏形。伴随教育民主化的持续推进，作为民意代表的

教育公益组织，将会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价值。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看到，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阶段，教育公益组织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公众参与的制度化瓶颈对它们的发展有着很强的制约，如何构建民意表达的信息基础成为一个挑战；同时，独立研究的专业性能力也亟待提高，与政府沟通协同合作的能力尚需提升。虽然公益组织已为国家治理教育改革“志愿”分担了许多责任，但公益组织成为成熟稳定的民间进步力量参与治理，自身仍需要发展，同时离不开政府的积极认可，尤其是国家层面需要调整社会组织管理政策，从制度、资源及项目上给予非政府组织平等待遇，使这一“国家的民间力量”成为推动教育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的基层机制。